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81期

目 录

【专稿】

叶维丽 坚守学术规范 维护学者尊严
——我对李永胜教授文章的质疑

【研究】

郭罗基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
施滨海 华国锋为什么选择辞职（二）
——“党分裂，我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序跋】

胡宗式 章 铎 用史料作证，让历史说话
——我们为什么要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书评】

舒 声 略谈应该怎样选编文革历史资料
——兼评胡宗式 章铎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孙月才 历史的见证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读后

曹之亮 追求真相 严谨治学
——评胡宗式、章铎合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樊能廷 对《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的几点考证
附：《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
的三个版本

【资料】

陆平在哲学系教职员党员整风会议上的发言（1965.12.30）
井冈山广播台记者特写报导：
《红太阳照亮了井冈山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樊能廷提供）

【本刊声明】

【专稿】

坚守学术规范 维护学者尊严

——我对李永胜教授文章的质疑

叶维丽¹

最近，我在《史学集刊》2020年第三期看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永胜的一篇文章，题目为《顾维钧与中国留美学生会》。文中第一段这样写到：“他（指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领袖人物之一，广泛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活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界论述顾维钧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活动情况主要依据《顾维钧回忆录》的记述。但《顾维钧回忆录》所记过于简略。本文主要依托英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有关内容，对顾维钧留学美国期间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活动情形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

“目前学界”关于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活动，是“主要依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述”吗？是否已有学人根据《中国留美学生月报》（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对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留美学生活动做过认真梳理和研究？这是我要问李永胜教授的两个问题。

200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著作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将该书翻译出版（《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并于2017年6月份再版。

我书中第一章题为“学生社团和中国的民族主义”（Student Associational Lif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该章所依据的最主要的原始资料，就是英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还记得80年代中期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一册册（耶鲁有全套）灌注了留学前辈心血的出版物时，心中的激动和感慨。多年来它们躺在图书馆角落里，无人问津。根据这套月刊及其他相关资料，我对“留美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即李文中所称“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早期历史、中期演进和后期衰落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审视（见2017年北大版 页22-50）。在这一章，我从同期众多中国留美学生中“挑选”出两位代表人物：顾维钧和胡适，对他们的情况分别做了专门介绍。之所以挑出

¹ 本文作者为美国麻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荣退教授。

顾、胡二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按照新理念行事”，积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活动和他们所在美国大学的学生活动，其中34-36页专门讲顾维钧。书中其他章节也写到了顾维钧，包括他的体育活动和婚姻生活。为找寻顾维钧材料，我专程去过哥伦比亚大学Butler Library的Archival Collections(档案资料室)。英文版Index里(即“索引”，中文版没有翻译)，顾维钧的名字总共在19页上出现(每页上往往出现不止一次)。

李永胜教授的文章主要写顾维钧，其中有不少顾留学期间的新材料，此外，他也用了些篇幅谈“中国留美学生会”历史。他是在我本人已经做过的大量工作基础上写作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在一定意义上，我的研究为他提供了路线图。但是李教授对我关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历史和顾维钧在美期间活动的奠基性研究，只字未提，给读者以他做的是original(前人未做过的)工作之印象，具有学术独创性。

他不提，或是不知，或是明知而不提。如果是前者，那暴露出的是李永胜教授在学术上的孤陋寡闻；如果是后者，那么李教授就是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做学术研究，有一条中外通则，即首先要回顾有关学术史，要说明在你之前是否有人做过相关课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是国内研究留学生史重镇。2017年8月下旬，我应邀参加由南大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留学生史研讨会，并做keynote speech(主题发言)，历史学院有多名教员与会(我没有记住名字)。此前不久的6月份，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我的书。我所以参会并做发言，就是因为那本书。会议组织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位副教授在邀请我参会时，正是这样说的。

李永胜教授本人是否与会，我不得而知。但身为南大历史学院博导、做同一时期留美学生研究的李教授，会不知道叶维丽的那本书，我不相信。李永胜教授，我恭候你说服我。

写这篇小文，既是维护学术规范，也是维护我作为一名学人的尊严。这不但因为在全书中我对第一章倾注了最多的心血，更因为李永胜教授的做法反映了一种极不可取的学术风气。对此，我不打算容忍。做学问最基本的品德是诚实。本文所针对的，不是一个人或一篇文章，我不希望看到的是此种风气畅通无阻，而不受到鲜明而坚决的抵制与批评。❏ (2020年6月于波士顿)

【研究】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

郭罗基

提要：“九一三”之后，中央出现两种对立的思潮——周恩来和《人民日报》主张批极左，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主张批极右。毛以“形左实右”为名，在《人民日报》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批邪”运动。胡绩伟、王若水被惩处。为了坐实林彪的极右，毛说林彪和孔子一样都要复旧。“批林整风”由此转为“批林批孔”。1949年后，毛之所以由反左而一变为极左，端在其坚持的主观社会主义。文革是毛主观社会主义的顶点，批极右会导致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自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否定毛的一路反右。因此，批林彪的极右，是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文革 主观社会主义 左倾 批林整风 批林批孔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分水岭，前后恰好大致都是5年。前期的主题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后期的主题是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批倒批臭刘少奇的时候，拉来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做陪练；批倒批臭林彪的时候，又拉来一个古人孔子做陪练。前期，文革冲天而起，高歌猛进；后期，文革盘桓回旋，不知所终。就毛泽东本人的动机来说，却是前后一以贯之。²10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为文革辩护，防止被人所否定。这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任务。

² 恰如我逝去的朋友张显扬所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见《开放》2005年5月号。这是就毛泽东本人的动机而言，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延续下去，还有其他许多条件。

时来运去生感叹

1971年，林彪覆灭后，中国的时局面临一个转折点。转折，可能从坏转向好，也可能从坏转向更坏。不幸，前一种可能错过了，后一种可能成为现实。

打倒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被尊为“伟大舵手”毛主席的“伟大助手”。据说，历史上有三个“伟大助手”：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第三个“伟大助手”就是林彪。这是林彪的历史地位，现实身份呢？1969年，把林彪作为法定接班人载入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个老朽和一个病夫联手的毛林体制。这个结果被认为是文革的“伟大胜利”。

“九一三”事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听传达的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外交部发生一个笑话，当场有人站起来对宣读文件的主持人说：“你念错了，是耿飊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背叛和灭亡，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理论上的破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的失败。但是中共中央的文件把破产和失败说成了“胜利”。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动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动集团，除了这一害。……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种自欺欺人的说辞反而促成千百万人的思考，走向醒悟。

不是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怎么没有“洞察”身边的“亲密战友”呢？伟大领袖的神圣形象遭到怀疑。毛泽东本人也几乎陷入精神崩溃，经常发脾气、摔东西，大病一场，从此一蹶不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变化较大，狂躁、发怒、猜疑、恐惧，常问我、问张玉凤，要我们放开讲、要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和张玉凤还是千篇一律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您老人家。主席听了有时会哈哈大笑说：‘我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会摆摆手说：‘又是一通屁话。走！走！’

走！’”³ 毛常常在藏书上反复抄写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⁴ 以林彪事件为分界，毛切身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时来”“运去”。

林彪事件损害了毛的健康。1971年10月8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时说：“我……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⁵ 但报纸上还是说他“神采奕奕”，这是报道毛主席的专用词汇。

过了好几个月，毛缓过气来了，才着手收拾败局。

群众自发批极左

1970年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始批判投靠林彪的陈伯达，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批陈伯达本是敲山震虎，指向背后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后，顺理成章，“批陈整风”运动拓展为“批林整风”运动。林彪的败亡，引发人们大量宣泄对文革的怀疑和不满，故“批林”的同时，还要强调“整风”。“批林整风”的“整风”和“批陈整风”的“整风”不一样，后者是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起哄的人；而前者是整对文革怀疑和不满的人，防止矛头向上，稳住局面。“批林整风”运动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一争论又演变为“批林批孔”运动。

在毛泽东不理事的几个月里，群众自发地起来批林彪的极左。批着批着，就批到文革了。王洪文说：“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⁶ 一点不错，因为文革就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党史记载：“有一些地区和部门不是根据文件所定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意愿的呼声使‘批林整风’运动突破了原定的框框。”⁷ 批林彪

³ 出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初稿。1996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时，将“有损领袖形象”的内容删除，留作档案资料。见文学城。

⁴ “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说，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阎长贵：《戚本禹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2008年12月，凤凰历史，2016/04/22~23）这两句古诗出自唐人罗隐的七律《筹笔驿》。

⁵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6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⁶ 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1974年3月18日。转引自《周恩来传》（201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85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的极左，必然会批到以极左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林彪的言论，本来就是附和毛泽东、激化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支持群众的愿望，在实际工作中从各方面大力纠“左”，也就是纠文革之偏；“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逢会必讲，批极左。3月9日，周恩来在全国出口商品生产工作会议上说，受极左思潮影响，手工业很多人改行了；4月9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后，发表谈话说：“看来你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肃清。”“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结合。”“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⁸直到1972年秋，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会议、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多种场合，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教育战线是文革的突破口，因为教育战线上极左思潮的泛滥由来已久。教育问题上极左的表现之一是高喊“开门办学”“任务带动学科”之类的口号，轻视、忽视以至于无视基础理论的教学。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杨指出中国教育和科学的严重问题是削弱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周恩来当场对陪同接见的物理学家、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了一信，分析我国基础科学落后的原因，认为“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建议“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周恩来于7月23日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指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评及对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做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⁹

周培源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一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他对“教育革命”中的“理向工靠”“理工不分”¹⁰“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按产品划分专业”等削弱和取消理科的极左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张春桥、

⁸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8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¹⁰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嘲笑知识分子“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这是典型的“理工不分”的论调。应该嘲笑的是姚文元自己，他连理科和工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理科根本不教“开机器和修机器”，工科教的也不全都是“开机器和修机器”。

姚文元以征求意见为名，召开座谈会，进行诘难；最后，阻挠《人民日报》发表。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此文。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在他的指使下，连续发了《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理论基础？》等文，进行攻击。¹¹ 总理周恩来交给周培源任务的同时没有交给他权力，导致周培源关于办好大学理科的意见在北大行不通。北大党委副书记、军宣队负责人郭忠林说：“什么有钉子要拔掉，还不是拔掉我们！”真是不打自招。周培源有权力把他们“拔掉”吗？没有，而且他们还反攻过来。郭忠林在物理系的大会上居然批判有人“利用加强基础理论来复旧”，是“上下呼应”。¹² 但广大教师听到周恩来的指示，看到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所写的文章，无不欢欣鼓舞，不仅理科，就连文科的教师也在暗地里下功夫，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抵制极左思潮。

反左与反右的较量

1972年下半年，看来周恩来想进一步推进批极左。8月1日、2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天向外交使节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做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等问题的看法，主题就是批极左思潮，并批评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就有嘛！”“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¹³ 周恩来的讲话在人民日报社传达后，众人兴奋，正准备批极左，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人民日报社，与军宣队和几个负责人谈话。张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的时候，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还

¹¹ 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85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¹² 《郭忠林罪行综合材料》，郭忠林项目组，1978年10月。

¹³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20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同志谈话纪要，1971年8月1、2日。（误，应为1972年）

反对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¹⁴ 张、姚的态度与周恩来显然不一致。

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其中有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竟敢删去两处“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

在一个时期中，周恩来主导批极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主导批极右。群众对批极右很反感，有人说：“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极右，就会越批越‘左’。”¹⁵ 批极左，得到群众拥护，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无论如何，“1972年属于周恩来，而不属于江青的激进派”¹⁶，这是外国观察家的评论。

《人民日报》批极左

反左还是反右？在中国是政治风向标。反右意味着“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着“落实政策”，纠正冤案，宽松。《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许多人站在周恩来一边，不赞成张、姚的说法。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王若水趁张、姚不在北京，于1972年10月14日编发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黑龙江革委会写作组以“龙研”的名义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这一动向受到舆论重视。法新社当天就发了电讯，进行报道，说文章“批评红卫兵，为老干部讲话”。11月4日，张、姚所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第312期发表工人座谈会的“反应”，说《人民日报》批极左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到群众头上了”。11月6日，又公开发表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还说全国有9家省市级报纸转载了，8家报纸虽未转载，也

¹⁴ 王若水：《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又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614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¹⁵ 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列举的反面看法，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35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¹⁶ Laszlo Lan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71~1985: A Self-Portrai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8, p. 355

发了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意思是流毒全国。这是自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又一次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姚文元将《文汇情况》转给人民日报社，要求讨论，还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问他本人的态度，他推托说那几篇文章还没有看——够狡猾的。《人民日报》的人当然不会轻易上钩，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胡绩伟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¹⁷

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地方党委的调子也很混乱，有的批极左，有的批极右。王若水一不做二不休，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谈“批林”的方针问题，希望统一于批极左。

毛泽东亲自出马做裁决

王若水不知道，在他写信之前，战斗已经开始了。

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周恩来讲的精神，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拟召开全国外事会议讨论。11月30日，周批“拟同意”，将报告送毛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1日，张春桥阅后对批极左思潮提出异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判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判林彪叛徒的同时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¹⁸

王若水的信，对上层的斗争起了催化的作用，结果即将揭晓。信的主要内容是：

总理在8月1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还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个指示很重要。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8月8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

¹⁷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616-617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¹⁸ 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72年11月30日，12月1日、2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册，20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

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

这些天，我反复思索了这个问题。我想，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表现形式来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我认为批极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汇报的观点是来自主席，……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¹⁹

最后的几句话是很雄辩的，看伟大领袖怎么“指示”。

王若水在信中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不同意见。批林彪的极左，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王若水没有任何辩解。

毛泽东收到信的第二天，约见江青。江青要见他，他不见；需要江青的时候，招之即来。毛对江是爱恨交加。谢静宜曾告诉吴德：“毛主席说，江青是个大女流氓，有野心。”²⁰骂她“女流氓”不过瘾，还要加个“大”字。相处几十年，毛不会不知道她的恶。但江青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使唤起来得心应手，有事还真少不了她。

王若水的信揭示了周恩来与张、姚的意见分歧，毛的意思大概是让江青出面仲裁。他要江将王若水的信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并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一次话。怎么谈？他不说。江青说了。她向周恩来提出：“我们先谈一下，统

¹⁹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572~575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又见《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178~18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²⁰ 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196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一一下认识。”三个主张批极右，一个主张批极左，怎样“统一认识”？可想而知。

王若水的信件导致毛泽东亲自出马，对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做出裁决。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对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发表谈话：²¹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年迈昏庸，语不成句。）²²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²³

左倾或右倾，极左或极右，是共产党内对抗正确路线的错误路线，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倾向性错误。“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等不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倾向性问题，不是路线问题。毛泽东把一切坏事说成右，极端的坏事就是极右。他的思维能力大大的退化，厘不清头绪了。除了衰老的自然因素，主要的还是站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的立场，不可能面向真理了。中国的命运却就捏在这个思维能力退化、厘不清头绪的老人手里。

由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和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左倾，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批左是高压线，碰不得的，连王若水也说：“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但就表现形式来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事后王若水承认：“这封信反映了我当

²¹ 据《周恩来传》下册，毛泽东的谈话对象是张春桥、姚文元（第2026页），而《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说谈话对象还有周恩来（第1648页）。这两本的相关章节出自于安建设。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对此有如下评述：

“12月17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极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张春桥、姚文元整理的毛泽东关于要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第392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²² 王若水参与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哲学论战，他与艾思奇为一方，杨献珍等为另一方。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他没有参与。

²³ 《王若水上毛泽东书》附（一），引自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18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及《毛泽东全集》均不见此谈话。

时的思想，其中就有‘左’的影响，尽管我主张批‘左’。”²⁴ 错误路线的“实质都是极右”，不能说极左；林彪的极左只是“表现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创造的“形左实右”的概念，而“批林整风”连“形左”都不能说了。

人民日报的“批邪”运动

一时盛传，毛主席说《桌子的哲学》²⁵的作者王若水“不很高明”。王若水真正“不很高明”的地方，在于没有看出张、姚的背后就是毛，还给他写信，自投罗网了。“不很高明”抵得上什么罪名？1972年12月19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拿鸡毛当令箭，当着周恩来的面，在人民大会堂把王若水批了五个半小时（还有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²⁶、吴冷西在场）。周恩来主持会议，讲话很多，但较为凌乱。他既要贯彻毛的批极右的指示，又要为自己讲过的批极左打圆场；他既要批评王若水，又要保护王若水。他是一个难演的角色。江青说：“《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以前，你们揭露过他的极右路线吗？张春桥说“天下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按照这种逻辑，凡是毛主席号召的、毛主席决定的，就不是问题、不是错误。极左也是毛主席号召的、毛主席决定的；林彪的极左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拥护毛主席的决定，所以不能批。张春桥泄露了不能批林彪的极左的秘密。姚文元说：“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王若水说：“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姚文元号称“金棍子”，名不虚传。张春桥的结论是：人民日报有“一股

²⁴ 同上，181页。

²⁵ 《桌子的哲学》是1963年王若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认识论的通俗哲学文章，影响很大。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²⁶ 鲁瑛（1927—2007年），本是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办公室主任。1966年6月初调到北京，作为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成员，进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工作组的成员相继离开，鲁瑛留下来成了实际负责人。1974年，张春桥、姚文元把他扶上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位置。此人文化水平不高，知识贫乏，出尽洋相，人称“草包总编”。读报唸到“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他念成“游戈”；说到志愿军炸坦克“履带”，他念成“覆带”；把洛杉矶成“洛彬几”，把墨西哥唸成“黑西哥”。鲁瑛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周一面修改、一面摇头，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张春桥知道鲁瑛“弱得很”，但又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鲁瑛同志要支持”。粉碎“四人帮”以后，鲁瑛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邪气，一股势力”，要“把邪气压下去”。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²⁷

张、姚在人民日报社的走卒鲁瑛回去就发动“批邪”运动，从1972年底到1974年底，整整批了两年。胡绩伟（当时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做出处理：胡绩伟发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红星公社团河南队劳动改造。

至于周恩来，批极左，口头上不说了，行动上照做。国家计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指示：

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的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的破坏一直到“九一三”。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²⁸

反左倾的代表何以又成为左倾的代表？

“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经毛泽东裁决，与王若水和很多人的愿望相反，统一于批极右，谁还敢言批极左？从此风向变了。1973年1月，北京市召开的“批林整风”座谈会上，强调“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口批‘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²⁹，谁批极左思潮就成了“别有用心的人”。1973年10月，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北大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把1972年的批极左说成“右倾回潮”，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迟群在会议上说：“我们要警惕，有些人现在批极左，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社会主义。”清华、北大有一批教师被军宣队打成“内定右派”，本人

²⁷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册，623-637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²⁸ 《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引自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第89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²⁹ 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第31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也在其中。这个运动搞了三个月，后来就叫“三个月运动”。幸而“三个月运动”没有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故技重演。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应反左，为了打倒彭德怀，毛泽东强扭为反右。大跃进的狂热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导致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到1972年，由于批极左，文革得以暂时喘息。1972年的“批林”，本应继续批极左，毛泽东强扭为批极右。1973年以后，又高歌“向左进行曲”，一路狂奔，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多次发生左倾路线，冒险盲动，几乎全军覆没。毛泽东是反左倾的代表，在危难中挽救了共产党，因而取得领导权。1972年底，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重提毛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说毛写了10篇文章，现存9篇，批左批得很透，总有一天要把这9篇文章印出来。1949年夺取政权后，毛泽东自己却跌入左倾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起，他就走上了左倾的道路，在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地方和时间决意搞社会主义。为了维护这条左倾路线就不断反右，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愈来愈左，至文革而达于极左。林彪从反刘少奇的右起家，独占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位置。林彪覆灭后，毛泽东、“四人帮”反林彪的极右。“四人帮”覆灭后，华国锋如法炮制，又反“四人帮”的极右。几十年来，共产党因不断反右而左倾路线一路延伸，愈陷愈深。

毛泽东作为反左倾的代表何以又成了左倾的代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毛泽东代表左倾，故他讳言“左”，一贯反右；实在说不过去，也要说“形左实右”，左的东西实质还是右。夫复何言！

批极左或批极右，是保卫文革的攻防战。唯恐文革遭否定，这是毛泽东心病。

毛泽东自认一生做了两件事

1972年见了尼克松之后，直到逝世前不久，毛泽东与身边的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谈到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把

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后一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听到他谈话的护士长吴旭君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³⁰这是一般人都会发问的。《毛泽东传》的作者妄评：“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³¹怎么“不适当”？非常适当；怎么“不符合实际”？完全符合实际。1949年以前，28年的奋斗做了多少事，可以归结为夺取政权这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应该说是两件事吧？他说是一件事，就是干暴力革命这一件事。1949年以后做了多少事，可以说是干社会主义这一件事。毛式社会主义，经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联动，引向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毛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中的一件，而且是事业的顶点。1937年，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分，比作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一生做了两件事与文章的上、下篇，完全是一个意思。也可以说，前一件事，即文章的上篇，是夺取政权；后一件事，即文章的下篇，是运用政权。毛泽东没有提到这两件事、文章的上下篇的相关性。为什么“持异议不多”的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在运用政权时做出来的事情会“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是更为深刻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否足以代表“下篇”？这是毛泽东自己清楚而许多人迷糊的地方。

1953年，斯大林逝世，毛泽东雄心勃发。他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刘少奇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反而被他指责为右倾。6月1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发言，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结果，不到3年，1956年1月，中国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按毛泽东自己的标准，也是“走得太快，左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均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³²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所

³⁰ 访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6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³¹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7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³² 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1957》中“祸起总路线”一节（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

不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推行空想社会主义的手段是说服和示范，说服不了，示范失败，只好散伙。毛泽东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企图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不服就压，因而造成灾难，结果下了地狱。

为了制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毛泽东又拿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来吓唬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地方“反资本主义复辟”，只能倒退到前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

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又发动一场一场的运动来对付矛盾，维护主观社会主义。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厄运，根源就在于1953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文化大革命遭否定，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一路翻案翻过去。被打倒的刘少奇、彭德怀和一大批老家伙固然会站起来；彭德怀站起来，大跃进就倒下去了；大跃进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要反也反不了”，大跃进一倒，反右派也靠不住了；反右派是所谓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维护1956年宣布的“进入社会主义”。由此一直要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自感“上帝给我下了请帖”（与基辛格语），来日无多，要对一生做总结，盘点自己的政治遗产了。他深为忧虑，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他干社会主义这一件事，终将毁了一世英名。

毛泽东极力维护文革，理由是什么？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主席在3月25日（1973年）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³³

他说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是发动了文革，才揪出“刘少奇集团”，而是蓄意打倒刘少奇，才发动文革。不是在文革中揪出“林彪集团”，而是文革首先制造了“林彪集团”；“林彪集团”也不是文革揪出来的，而是自我爆炸的。林

³³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讲话记录，1973年5月26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6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彪覆灭之前一直是文革的副统帅。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它不合乎事实，不合乎逻辑。文革是无法维护的。

孤独的晚年

毛泽东的最后几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连运动，运动套运动，都是为了维护无法维护的文化大革命，即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的后一件事。以后一个运动维护前一个运动，为了掩盖旧的错误又制造新的错误，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可怜的“伟大领袖”，在泥潭里苦苦挣扎，至死方休。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病重之际，召见华国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有的版本提到还有汪东兴、毛远新），又说一生干了两件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³⁴

这是毛对自己的“盖棺定论”，语多唏嘘。“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到了“运去英雄不自由”的下世光景，无奈慨叹“只有天知道”了。此后，毛再也发不出“最高指示”了，这才是“临终嘱咐”。

毛对“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革忧心忡忡。他的政治遗产还是托付给以“四人帮”为骨干的一批人。几十年中，患难与共、生死之交的老战友

³⁴ 毛的这个遗嘱出自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402页，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52卷，第150页，又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782页等多种书籍。余汝信、曾鸣在《毛泽东“政治遗嘱”之疑》（《领导者》2014年6月号）中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提出强有力的质疑，但还未达到证伪的程度。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有多次，即使6月15日这一次证伪了，也不等于全都证伪。

都不见了。他把一大批人打倒了，自己也孤立了。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所着的《毛泽东传》的最后一章，题目就是“孤独”。

1976年，毛在黄昏岁月中度过最后一个春节。他的身边人张玉凤描述：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天上有几颗暗淡的星星。毛主席的住处笼罩在黑暗之中。没有客人，也没有亲人。……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³⁵

毛的晚景何其凄凉！

“批林”又“批孔”，坐实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当然明白，批极左就是批文革，批文革就是否定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的后一件事，即干社会主义这件事。他也一定知道，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极右没有什么说服力。林彪明明是极左，怎么会是“极右”？批起来理不直、气不壮。经过一年多的试探和酝酿，毛泽东把林彪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挂上钩，说林彪和孔子一样，都要恢复旧秩序、旧传统、旧制度。这还不是极右？大策略家毛泽东将“批林”从批极左扭到批极右，办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做实林彪的极右。于是，“批林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孔夫子的吗？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顾不得以往讲过什么了。毛虽经五四运动的洗礼，但他的主张与“打倒孔家店”一派不同。早在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³⁶这是被人们一再引用的毛的名言。次年，毛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评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

³⁵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³⁶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这样。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³⁷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将“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列，三个主义，都是褒义。³⁸他还谆谆教导干部们要学孔夫子的“每事问”“不耻下问”。他连给两个女儿取名李讷、李敏也是典出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30年代，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要继承孔夫子；70年代，同样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又要批判孔夫子了。所以，毛的“批孔”也是批他自己；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以否定自己为代价的。

诚如毛自己所说，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历史学的研究任务，批判林彪是政治任务，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对历史上思想文化的评论就变成了现实政治问题。

“批孔”为“批林”服务是为了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本来就不是为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后，有资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来。故“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周公”。

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举法家。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批判“尊儒反法”甚嚣尘上，将中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及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一律扭曲为儒法斗争史。

197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党、政、军负责人246人参加。会议的内容之一是讨论“批林整风”。由于“批林整风”从批极左强扭到批极右，会议除了关于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的空洞表态之外，讨论毫无生气。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号召大家学一点历史，还说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这是在中央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批孔”和“批尊孔”。随后传出毛的一首顺口溜式的五言诗《五绝·呈郭老》：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³⁷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60~161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

³⁸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崇拜孔二先。³⁹

起初，民间对流传的这首诗莫名其妙，把郭沫若与柳宗元比什么呀？毛泽东善用迂回战术，行动之初浑不察，一步一步，他的战略意图才暴露出来，等到完成了包围，人们才恍然大悟。1973年7月4日，毛泽东约谈王洪文、张春桥，二人是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的。毛没有谈两个报告，而是大谈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的文章，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几句话是针对周恩来的：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⁴⁰

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不料被他看穿，只得检讨。

毛又说到另一个重大问题：

郭老（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⁴¹

毛泽东反对儒家的人本主义，拥护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皇权主义。郭沫若自称是人本主义，就是和孔夫子一样。原来从郭老“崇拜孔二先”，引出郭老尊孔，而且还反法。郭老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一样吗？郭沫若当年可是激烈反对国民党的。从国民党又说到“林彪也是啊”，林彪和国民党一样吗？林彪可是与国民党打了几十年的仗的。毛泽东总是把他的政敌推向国民党。1959

³⁹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51卷，第380页。江青在1月25日大会上唸过此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说，他当面问过毛，毛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道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此。”（第140页）张耀祠此说没有旁证。所说“也不至于此”与事实不符，后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是与此诗相呼应的。

⁴⁰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51卷，第390页。

⁴¹ 同上，第393页。

年的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就说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毛从批评郭老“崇拜孔二先”开始，兜了一个圈子，落实到林彪头上。但从郭沫若到国民党，再到林彪，论证完全是武断的。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又批郭沫若，说：“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⁴²当然是希望杨向海外扩散。

同一天，周恩来对杨振宁说：“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⁴³

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显然是一种授意。他指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当场念了一首近作《读〈封建论〉呈郭老》，以供传播：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他还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44

⁴²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90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⁴³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07页。

⁴⁴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51卷，412页，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

唐人柳宗元，字子厚，着《封建论》，反对周朝的封建制⁴⁵、维护秦朝的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在20世纪已经没有现实意义，疑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书稿信手拈来。莫非寄意反对复古、反对倒退？一贯皮里阳秋，叫人费思量、摸不透。无论如何，柳宗元的《封建论》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没有什么关系。

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是抗战时期写作的评论先秦人物和思想的十篇文章的结集。当时郭沫若骂秦始皇是影射蒋介石，毛泽东并没有“劝君少骂秦始皇”，而且唯恐骂得少，希望“大骂”，因为他是陈胜、吴广。1949年，陈胜、吴广翻身了，毛泽东有了秦始皇的自我意识，自认为他的“焚坑事业”超过秦始皇百倍。所以骂秦始皇就是骂毛泽东，岂止“少骂”而已！经过批评“尊儒反法”的铺垫，毛泽东亮出了心曲。1973年9月23日，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话题转到秦始皇。他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⁴⁶

⁴⁵ 封建制的原意是分封建邦制，分封诸侯，建立邦国，藩屏天子，以天子为共主。近代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将欧洲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形态 Feudal System, Feudalism 译作封建制、封建主义。Feudal, Feudalism 的词根 feud 是采邑，取其表面相似之处译作“封建”，其实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与中国周朝的社会形态大不相同。“封建”一词，翻译虽不确切，但在流传中已经具有与“分封建邦”不同的含义，成为同一词语表达的具有不同内涵的不同概念。一个概念是作为政权形式的封建，封建制与郡县制相对；一个概念是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封建制与奴隶制、资本主义制有别。“反帝反封建”的“反封建”，当然不是反对“分封建邦”。有人说：“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一帝国，它以郡县制度除了封建制。……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谓‘封建制度’。……”（见何新的《中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审视》）还有人说：“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见易中天的《重写中华文明史》）这些自作聪明的人，以为有了重大发现，还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只不过犯了一个简单的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混淆了作为政权形式的封建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

⁴⁶ 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901页的引文，删去了“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两句，而且不打删节号。既然“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称“我”是秦始皇是捧我，怎么成了“骂我”？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删去了为毛泽东遮丑。

毛泽东批判“尊儒反法”的人格化，落实到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秦始皇和孔夫子不是同时代人，也没有共同点争论命题，一个是政治人物，一个是文化人物，把他们作为历史上的对立面，实在是牵强附会的。

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都喜欢在接见外国人时恣意发挥，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侯赛因·沙菲会对秦始皇感兴趣吗？实际上他们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毛可以自称“我也是秦始皇”，但“林彪骂我是秦始皇”就不行。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有人影射毛是秦始皇更不行，被定性为“反革命”。

但是，1949年以后，郭沫若并没有骂秦始皇呀！这是毛泽东的惯技，叫作“树立对立面”。1957年批“章罗同盟”，明明章伯钧和罗隆基一向不和，毛泽东“拉郎配”，硬说他们两个是“同盟”，不是同盟也是“同盟”。“批林批孔”也需要树立一个“尊儒反法”的活生生的对立面，叫得响的就是郭沫若了。

“批林批孔”的吼声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由上而下，制造舆论。

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批孔”号召的是南方的杨荣国⁴⁷，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并非投机客，他是一贯反孔的。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约稿。8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内刊《情况汇报》第2253期上看到此文，批了四个字：杨文颇好。经毛泽东批准8月7日公开发表，⁴⁸电台纷纷广播。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一时成了“批孔反儒”的明星。

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亮相（后以“梁效”行时），在《北京日报》发表《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出场就口吐火药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

⁴⁷ 杨荣国（1907—1978年），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1938年加入中共，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1946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继续研究，后来出版了代表作《中国古代思想史》。1949年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院系调整时，全国调整到只有一个哲学系，属北京大学，杨入中山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56年公开党员身份，当选为中山大学党委委员、常委。1960年，中山大学恢复哲学系，杨荣国任主任。

⁴⁸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901页。

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瞄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除了刘少奇、林彪，当然还有别人。

9月15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⁴⁹创刊号发表“石仑”⁵⁰的《论尊儒反法》（经姚文元修改），说：“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也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儒法斗争成了党内的路线斗争。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0期转载此文。

9月27日，“唐晓文”⁵¹在《人民日报》发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红旗》杂志1973年第12期又加以转载。文章显然不限于议论教育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向是‘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继承了尊孔的反动逆流。……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表明，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9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焚书坑儒”辨》（施丁），认为“焚书坑儒”是反复辟的进步措施。古为今用，为文革中的“焚书坑儒”唱赞歌。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罗思鼎”⁵²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是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向朱永嘉布置的任务，成文后又经姚文元修改）。文章在歌颂秦始皇的同时，借批宰相、反复辟影射周恩来。文中大批吕不韦的“折中主义”，将古代历史现代化。文章还点了战国末期一批宰相的名。江青唯恐别人不明白，点拨道：“这

⁴⁹ 名义上是“复旦大学学报”，它的编辑部设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内，实际上是该写作组的机关刊物。

⁵⁰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化名之一，见以下“罗思鼎”注。

⁵¹ 由康生控制的、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的化名，首见于1972年的《红旗》杂志，主要成员有武葆华、张载伦、杨福云、黄允升等，还用“汤啸”“辛风”“学泽”“唐拓”等化名。从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唐晓文”发表了50多篇文章。江青对“唐晓文”视同“梁效”。1973年6月的天津之行，江青说：“我带的不止是两校，是三校，还有党校。”

⁵² “螺丝钉”的谐音，取义于雷锋的“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原为20世纪60年代朱永嘉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几个青年教师共享的笔名，朱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以后沿用之。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是1971年7月正式成立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遥控。所属各写作小组还用“丁学雷”（驻地是丁家花园，意为在丁家花园学雷锋）、“石一歌”（包括余秋雨等11人）、“康立”“石仑”“史锋”等众多化名。从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156篇文章。他们除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还直接控制《学习与批判》（复旦大学学报）、《朝霞》《教育实践》等刊物。

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⁵³《红旗》杂志同期发表《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从林彪推而广之，“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

11月16日，《学习与批判》（上海）第3期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第一次提出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也是掀“现代大儒”的先声。

“批孔反儒”，渐成气候。这首儿歌反映了时代气氛：“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

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在《访美观感》中记载了一则幽默：“在纽约唐人街的入口处，迎着我的是一尊高大的耸立的孔子铜像，我仔细一看，下面基石上刻有造像的日期，正是国内‘批林批孔’荒唐、疯狂的年月。华侨请夫子来纽约避难，倒也很幽默。”⁵⁴

⁵³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发[1977]37号，1977年9月23日。

⁵⁴ 《文汇报》，1985年8月28日。

【研究】

华国锋为什么选择辞职（二）

——“党分裂，我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施滨海

提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本想联合邓小平、陈云辅佐华国锋作为毛的接班人。但是，邓小平通过整人事抓军队、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掌控了军权。又以华搞“两个凡是”为由，占领了思想政治的制高点。随后，以克服经济的急躁冒进为由，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掌控了政权。至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华国锋的权力丧失殆尽。邓小平从而完成了个人专权的战略布局。

关键词：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陈云 两个凡是

三、华国锋萌生退意

1979年10月12日，华国锋乘专机前往乌鲁木齐，即将开始他的西欧四国即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国事访问。

四天后即16日，邓小平召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耿飚、杨勇、王平、韦国清、胡耀邦、宋任穷等，商议全国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等主要领导干部的调配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还找了一百多人谈话；叶剑英则在广州休息和调查研究，前文谈到冯文彬曾去广州向叶汇报中央人事安排。

11月10日下午，华国锋由乌鲁木齐乘专机回到北京。

次日，彭真到华国锋处说：“这一个月的时间，邓召集了很多人谈话，你要注意这个动向。你考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找他们谈话？”华对彭说：“你讲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如果我也这样做，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党的分裂，我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啊！”¹

¹ 田西如接受笔者访谈（2016年11月18日）

12月下旬，叶剑英回到北京后，在与华国锋谈话中也谈到了彭真提出的那个问题。华向叶表示：“他（指邓小平）要干，就让他干，反正他也是要搞经济的，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华国锋第一次向叶剑英谈到了自己的退意。

可见，华国锋很不愿意看到因为他的原因而使党内再起纷争，从而影响到已经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来之不易的大干快上的经济形势。

邓力群的回忆也颇能说明这一问题。1978年11月，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访问日本。回国后，邓力群在其《访问归来的思索》一文中写下一段颇使人玩味的话，从中也可看出华国锋对于党内斗争的认识。

他写道：“有的日本人说，你们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今天这样整，明天那样整呢？华国锋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也常常变。日本政局比较稳定，也有变动，内阁改组，党派斗争，屡见不鲜。可是这种变动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内、国内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但是应当使这种斗争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¹

对于华国锋已经萌生退意，叶剑英内心十分复杂。

1980年5月27日，华国锋前往日本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于6月1日下午，乘专机由大阪回到上海。

据华国锋秘书曹万贵回忆，在华国锋出访期间，叶剑英办公室多次致电华国锋办公室询问华回国途经上海的时间。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1980年4月11日-5月30日，叶剑英“在广东省视察、参观和休息。”²在此期间，5月17日中午，叶乘专机从兴宁机场起飞，下午回到北京。

这一天，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

至于叶剑英什么时间由北京返回广东，又什么时间由广东抵达上海，《叶剑英年谱》均语焉不详。

6月1日，华国锋在上海看望叶剑英。关于这次见面至今未见于任何公开资料，包括《叶剑英年谱》。唯一能够证实他们见面的，只有新华社新闻摄影部

¹《访日归来的思索》，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著，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²《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186页。

稿件处理表上登有记者钱嗣杰的记录：华国锋同志看望叶剑英同志，拍摄时间：80年6月1日。¹

叶剑英为什么选择在上海等待华国锋回国，他们究竟谈了什么，时至今日，仍是个谜。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6月4日，华国锋在结束视察江苏等地回到北京；6月11日，胡耀邦与赵紫阳同机飞抵上海看望叶剑英并向他汇报工作。

据《当代上海大事记》记载：“6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接见市党政领导，并到华东医院探望因病住院的领导同志。”²但并没有提及赵紫阳，更没有记录他们曾看望过叶剑英。

据《粟裕年谱》记载：“6月12日下午，去拜访正在上海的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同志。谈话中，胡、赵传达了中共中央拟由粟裕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决定。在谈及粟去年10月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受批判的申诉时，胡耀邦表示，这事要解决一下，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³

其时，赵紫阳已经协助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据鲍彤回忆，1980年5月3日，鲍彤到赵紫阳办公室任秘书。不久，华国锋来到赵紫阳办公室谈有关总理的交接工作，而华与华的秘书曹万贵在另一房间闲聊。一个小时后，华国锋与赵紫阳走出办公室，华与赵的谈话给鲍彤的感觉是“很愉快。”⁴

事隔30余年后，曹万贵在回忆这一场景时说：“看得出，赵紫阳接任总理，华是心甘情愿的。”⁵

据房维中回忆，1980年4月22日，赵紫阳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是赵紫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准备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长篇讲话。”⁶

现在，两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现任总书记，一个候任国务院总理，选择在这个时间一起到上海向叶剑英汇报工作，确实很不寻常。

鲍彤说，“无论在我担任赵的秘书以后还是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过胡、赵

¹ 彩印件（张人凡保存）。

² 《当代上海大事记》，第65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³ 《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第4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第2版。

⁴ 注39 鲍彤接受笔者访谈（2016年10月15日）。

⁵ 注40 曹万贵与鲁利玲、张人凡谈话（2014年5月23日）。曹原为华国锋秘书。

⁶ 注41 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三分册，1980年卷，第37—38页。

同时出差去外地的事情。”¹

显然，胡、赵上海之行十分神秘。

不过，胡耀邦在回到北京几天后，即6月16日，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召开的国家机关各部委贯彻《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和赵紫阳在上海与叶剑英见面谈话的内容。胡耀邦说：“前几天我同紫阳同志到叶帅那里汇报工作。叶帅说，扫除封建思想、封建余毒，非常重要”。不过，胡耀邦没有讲向叶汇报什么。

关于此次胡、赵向叶剑英的“汇报”，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的儿子王建军记述了叶选宁的回忆。叶选宁曾在生前同他讲过：“胡、赵同机到达上海，随行的还有赵的儿子赵四军。他去机场接机”。“叶选宁还透露，在他们同叶帅见面汇报前，胡耀邦曾提出是不是先同选宁吹吹风，再看看叶帅的反映”“但赵紫阳不赞成，赵说党内还是不要开这样的先例。”至于胡、赵要谈什么，叶选宁告诉王建军，“当然是关于华国锋”。²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并由赵紫阳接替，其时已成定局。后在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赵紫阳接掌国务院，成为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在这个时候，再谈华国锋问题，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的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

王守江晚年回忆，1980年6月叶、胡、赵见面后，叶送走胡、赵回来。我看得出来，“叶不高兴。”³所谓“叶不高兴”，自然是反映了叶不赞成变动华国锋的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其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着对华国锋的批评。

¹ 注 42 鲍彤接受笔者访谈（2016年10月15日）。

² 注 43 王建军接受笔者访谈（2017年3月31日）。

³ 注 44 王守江与张人凡谈话（2017年3月24日）。王原为叶剑英办公室主任。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后来被许多人视作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者，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披露了这篇讲话的真实意图：“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作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¹

后来，继华国锋后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²

邓力群和赵紫阳的回忆都表明，邓这篇讲话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政治学者吴伟对此评论道：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在其发表后的30多年中，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是很少有人指出，邓小平当时作这一番讲话，其目的，至少是主要目的，不是在于向全党作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而是在于解决当时中央的组织人事格局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针对华国锋，给华国锋施加压力的。对于一些研究者至今仍在有意或无意地突出讲话的反对封建主义背景，而闭口不谈“解决华国锋问题”这个更直接、对当时中共高层更有现实意义的背景的做法，我不赞成。³

8月30日深夜，叶剑英到访华国锋官园八区的住所，两人促膝长谈。

35年后，2016年2月16日上午，华国锋夫人韩芝俊、长子苏华向作者和

¹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183页，大风出版社，2006年3月版。

² 《改革历程》，赵紫阳著，第272页，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5版。

³ 吴伟：《邓小平“8.18”讲话的台前幕后》，《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22日）。

同时在座的项南秘书杨志栓披露了叶和华谈话的核心内容：

叶：你在邓的问题上究竟准备怎么办？

华：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

叶：邓小平比“四人帮”还厉害？

华：那当然“四人帮”更厉害。问题是，这个党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老百姓也经不起折腾了。如果斗争，可能党要分裂，我们都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啊！我的考虑就是辞掉一切职务。

叶：如果这样，你就要准备至少坐20年的冷板凳。

华：就是当一个老百姓嘛！

事后，华国锋曾同韩芝俊和苏华说过，“叶帅的处境也难。”

叶剑英不赞成再动华国锋的职务，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等也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在胡耀邦看来，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很可能是一步险棋。胡德平记录了1980年10月12日胡耀邦对他的谈话：“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¹

此时，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稿会议正在继续进行。

11月23日，胡耀邦又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²

邓小平对胡耀邦不赞成动华国锋，甚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还要为华保留副主席位置，十分不满，一直耿耿于怀。十二大过后半年，1983年3月1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胡耀邦遭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即便如此，邓小平仍然坚持“胡赵格局不能变”，但已对胡耀邦多有不满。

5月23日，邓小平单独同胡启立谈话，认为胡耀邦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告诉胡启立：胡耀邦“在郭罗基、王若水等人的问题上与我和陈云不一致；他不赞成华国锋下”。邓甚至说，“讲四项基本原则，我是针对他的！”最后，他对胡启立说，“你胆子小，但你在他们（指胡耀邦与赵紫阳）当中和稀泥是对的。寄希望于紫阳。”

¹ 胡德平：《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² 同上。

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启立谈话，并要求向胡耀邦转告。邓直指胡耀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小平与胡启立的这次谈话，一直到数年后召开的那场专批胡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胡启立才谈出来。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赵紫阳也多次说过，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在晚年表示很遗憾，“可以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在解决华国锋问题上，赵对家人曾经有过几次谈话，他说：“对华这个人，毛还是看准了的，说他是‘老实人’。现在说他是造反派，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说不过去，他也是一步步做起来的，那种说法起码是不公平的。”

不过，在邓小平看来，华国锋“实际上是造反起家的。”至于粉碎“四人帮”“没有他，也会有人来推翻。”

中共十二大结束不久，金日成访问北京。自1953年邓小平与金日成首次见面，邓与金日成已有近三十年的交情，因而被邓小平称为“亲密的战友和同志”。1982年9月18日，已经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乘坐由北京至成都的专列上，毫无顾忌，将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职务的“理由”，向金日成和盘托出。

邓：这次召开的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人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典型人物是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对人事安排，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作了专门调查研究。十二大前，我们专门召开了全国人事工作会议，相当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华国锋、汪东兴同志的反映很强烈，认为把华、汪还放在中央领导机构不行，大家都反对。华国锋态度不好，汪东兴态度也不好。华国锋实际上是造反起家的。但他有一功，就是粉碎了“四人帮”。但对待这件事，华国锋本人又有错误，好像他这个功劳了不起，背了个大包袱。其实，没有他，也会有人来推翻“四人帮”。对“四人帮”，毛主席在世，没有人动手。毛主席不在了，总会有人推翻他们的。陈云同志曾同华国锋谈过一次话，谈得最透彻。陈云同志对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做。但华国锋没有这个自觉。粉碎“四人帮”后，他搞两个“凡是”。1978年9月，我去平壤参加你们的国庆活动时，曾同你谈过这个问题。其实，

在我还没有出来工作那个时候，他们就提出两个“凡是”了。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这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很简单，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但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他还要肯定文化大革命。

金：他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吗？

邓：他在十一大报告中就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字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他的含意是，还要继续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让我出来工作是有条件的，其中一条是要我出面来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不正确的，是反革命事件。我拒绝了。

金：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是华国锋掌权吧？

邓：当时他主持中央工作，不过说得公道一点，那个责任主要不在他身上。

金：当时他兼任公安部长。

邓：他是点了头的，包括镇压群众，主要是毛主席点了头。但是，华国锋应该有点自我批评精神呀！当时他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天安门事件是通过他向毛主席报告的。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他，但他也有责任。主要问题是他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我从医院出来后，汪东兴和另外一个人去找我，要我写一个文件，要在文件中写明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我拒绝了。我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后来文件我还是写了，只是写了一般工作问题。

华国锋上台以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就是批我呀，说我在搞“右倾翻案”。批了半年多，事后他对此也不作一点自我批评。这样，理所当然大家不赞成。以上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后来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不只华国锋一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抵制这个讨论。我从朝鲜回来后，在东北三省沿路讲这个问题，一下子传到全国。我们同华国锋的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也是思想路线

的分歧。

金：1978年9月，你在平壤也跟我谈过实事求是的精神，当时我表示赞成。毛主席也是提倡实事求是的。

邓：毛主席的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辩论，也叫争论，到1978年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批判了华国锋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才能提出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并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搞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简直是荒谬之极！张春桥写过一篇文章，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说什么宁要穷共产主义，也不要搞富资本主义。照他的意思，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贫穷的。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开始时可能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但是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必须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将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金：不管怎么说，需要有丰富的物资。

邓：到了共产主义，经济将高度发展，物资将极大丰富，这样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60元，农村最广大的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连起码的生活需要也无法保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因此，我强调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党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工作，用我们的语言说，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是我党工作的徘徊时期。不是一点好事也没有做，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当然，

这些好事并不是在华国锋的政治和思想路线指导下做的，而且有些事情他是反对的，比如对大批老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问题，华国锋实际上是不赞成的。谁晓得要平反的有多少万人啦！不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包括1957年反右，受“左”的政策打击的人，估计在全国恐怕有成百万。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进行平反，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的来说，那两年中，社会面貌没有大的改变。十一大报告中也强调了搞经济建设，但都空话，指标大得吓人，根本办不到。后来大家都要求华国锋作个明确的自我批评，他也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这样大家的反应都很强烈。原来设想，把他留在政治局，大家都不赞成。许多同志提出，华国锋连中央委员也不能当。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汪东兴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参加者，是个代表人物。原来我们提出让汪东兴也当中央委员，但预选时他落选了，华国锋刚刚过半数票。我们做了工作，汪东兴才当了候补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在最后一名。

金：我们感到华国锋理论基础好像比较弱。

邓：他懂得不多。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的数量还不小，他们寄希望于华国锋。这是不能让华国锋继续留在政治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要整党，要在整党中解决这些人的问题，现在他们都潜伏起来了，等到政治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又会动起来，而且这些人除了华国锋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现在他们只有寄希望于华国锋。因此，把这个菩萨从庙里搬走是有必要的。

金：是啊！很有必要，早点搬走好。

邓：从政治上考虑，不能把他放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这对他本人也有好处。华国锋这个人并不聪明，自觉性差。他有一个错觉，以为有好多人拥护他，架子放不下来。汪东兴也是如此。牵连比较大的有陈锡联、吴德、纪登奎。对纪登奎，早就没有考虑他了。但对陈锡联、吴德同志，考虑到他们都是老同志，过去有贡献，特别陈锡联同志，过去有比较突出的战功，因此，这次仍然选陈锡联同志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吴德同志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待遇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对这些犯错误同志做出的安排就是这样考虑的。对上述每一个人的安排，我们都做了一些工作，不然是通不过的。

金：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对。

邓：我们仍然按照毛主席在七大的方法处理。七大、八大仍让王明当中央委员。当然，华国锋与王明有一个不同，过去要选王明当中央委员，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影响，华国锋就不同了，特别是国内“四人帮”的牙牙爪爪寄希望于他。

金：华国锋过去有一定威望吗？

邓：在粉碎“四人帮”那个时候有一点。过去他并不出色。

金：我也是这样想的。

邓：他的经历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末期当过县委书记。解放后长期在湖南当地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前是湖南省委书记之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对所有的干部搞得很厉害，他也靠边站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搞三结合，他变成湖南省的头头，当了省革委会主任。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他属于造反派，虽然他也靠边站了一段，但没有受到打击。1971年、72年毛主席把他调到北京，当时他还不是副总理，但参加国务院会议。那时参加国务院会议的还有王洪文、纪登奎等人。华国锋平时没有什么见解，没有出什么主意，讲话也不多，那时给人们的印象是此人比较厚道，比较老实。我1973年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从1974年开始，毛主席指定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就着手在一系列问题上同“四人帮”搞斗争。那时我还想依靠华国锋，召开会议时让华国锋参加，连纪登奎也让参加了。当时华国锋不反对，但也没有出什么主意。到了1975年，我当了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全面工作都由我主持，那时我仍想依靠华国锋。

金：当时他还是公安部长吧？

邓：当时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周总理去世后，我的问题出来了，毛主席就考虑由谁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明白，让“四人帮”即王洪文、江青等人主持是不行的，大家不服，结果就想到了华国锋。当时华国锋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政治上不强，不合适。他通过别人向毛主席报告他的这个意见。毛主席说，我就是要找个政治上不强的人。就这样，他起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看出华国锋这个人并不厚道。最突出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处挂他和毛主席两个人的像，他对此感到心安理得。这就太不


谦虚了嘛！仅从这样一个问题，也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本质。我们认识了他的问题，就进行处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按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处理，大家都很高兴。

金：那很好嘛！

邓：谈了不少了，金主席休息休息，下午再谈吧？

邓：华国锋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处理比较容易，让耀邦、紫阳同志他们来处理就比较难了。你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谈的？你还想了解什么情况，我都可以告诉你。

邓完全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向金日成表明：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他甚至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说法以证明“倒华”有理，也是必要的。

距这次谈话的4年前，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认为“领袖是要通过实践去认识的。华主席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在实践中证明他是毛主席的合格的接班人。”“他是完全全国人民的领袖。”“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是全军的统帅。”为此，邓表示他要“努力当好华主席的助手，尽管是不那么合格的助手。”

【序跋】

用史料作证，让历史说话

——我们为什么要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胡宗式 章铎

毛泽东全程直接或间接操控北大文革运动。北京大学是文革的策源地，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弄清北京大学文革发生发展到消亡的历史，了解北大文革中所发生的事情，会有利于对中国整个文革的认识和理解。

在聂元梓主政北大的两年内，一直背负了各种各样的罪名，比如“陶铸、王任重操纵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逆流派”“分裂中央文革”“伸向

中央文革的黑手”“二月逆流新反扑”等等。后来是钦定的“派文革、逼供信文革、武斗文革”。1973年，聂元梓和她的主要助手孙蓬一被毛泽东的亲兵迟群、谢静宜等人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

“四人帮”倒台后，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曾一度欣喜若狂，以为他们惨遭“四人帮”迫害八年的沉冤有了出头之日了。然而，世事难料。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复出后，北大文革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聂元梓和孙蓬一，分别被判十七年有期徒刑和十年有期徒刑。《判决书》是他们的文革结局。

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这一伙，由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并组织人炮制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这是一起冤案。中共北京市委1979年2月和3月已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珮云同志做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中共中央组织部竟然发出这样无视历史事实的荒唐文件，是善良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在类似的政治导向下，聂元梓是“乱世魔女”“反聂”即革命，成了长期以来的主流舆论。被某些人奉为“信史”并极力捍卫的《北京大学纪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通过审判“五大领袖”和清理“三种人”，文革中的造反派几乎被一网打尽。北大的特殊之处是：北大被判刑或定为“三种人”的，清一色是原来拥护聂元梓校文革的；北大“反聂派”没有一个人被判刑或定为“三种人”。这种情况，至今仍被某些人引以自豪，甚至说“反对聂元梓是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弘扬”。但是，历史毕竟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主流舆论”阻止不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探究。

文革初期，我们和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在新北大公社动态组工作期间，我们亲历了北大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几十年的时代变迁，

面对谎言充斥的现状，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但长期以来，我们根本找不到发声的平台。直到2014年我们接触到电子杂志《记忆》，才结束了这种窘迫的状况。

从上世纪末，我们开始收集整理有关北大文革的原始资料。在众多校友的鼓励帮助下，《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终于在2020年5月正式出版了。受篇幅的限制，有很多资料尚未收录进来，但北大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这部书都有体现。它的正式出版，使我们一颗悬着的心平静了许多。

《选编》的众多资料是按北大文革发展过程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线索分明。北大文革的亲历者如果重读这些资料，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单纯读这部《选编》，很难对北大文革的始末有深刻的了解。我们正在编写的《北京大学文革史榷》也许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北京大学文革史榷》亦分上、中、下三册，内容暂定为：

上册：北京大学文革简述。

中册分为两部分内容：①北京大学文革大事记；②回忆与探索。

下册：史实与争鸣。多年来，关于北大文革的讨论，一些北大文革亲历者已写出数量不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北大文革的多个阶段，但认知上差异很大。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下册选用了数十篇北大校友撰写的文章。

在聂元梓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我们曾向她核实一些问题。例如：北大井冈山兵团散发的一份铅印传单《聂氏家族的复灭和聂元梓的前途》中写有“聂元梓的第一个丈夫：胡敬一，叛徒。”2017年春节我们去探望聂元梓，问她：“你认识胡敬一吗？”96岁高龄的聂元梓立即回答：“他是和我大哥聂真一起干革命的，1931-1933年来过我家，后来被派到北方，他长我20来岁。”后来我们从网上查询得知：1933年8月胡敬一就调到邯郸了。那时聂元梓才12岁，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此为一例。

北大文革的历史，也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与中央高层合作、裂隙到冲突的历史。这是北大不同于其他高校的独特之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以及将要出版的《北京大学文革史榷》凝聚了众多校友的心血。希望这两部书能把我们亲历的那段历史展现给读者。我们愿意在听取各方面批评和建议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书作进一步的修订，并以某种方式回馈读者。☞（2020.8.22）

【书评】

略谈应该怎样选编文革历史资料

——兼评胡宗式章铎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舒声

最近看到了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的胡宗式、章铎所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册（以下简称《选编》）。胡、章二位校友近八旬，近年来孜孜不倦地研究北大文革历史，收集整理北京大学文革资料，十分难得。他们这次出版的资料约100万字，内容繁多，其中确有一些是过去没有见过的稀有资料，对研究北大文革历史将会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收集整理和选编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和艰苦的工作，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从古到今，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都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笔者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对于应该怎样选编文革历史资料，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仁们共同探讨，并对胡、章二位的《选编》提出几点意见。

一、选编文革资料应坚持

真实性、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严肃性的原则

选编文革资料，关键在“选”，即从大量的资料堆里选择部分资料，然后再按照一定的类别和顺序进行编辑。而选择资料，应根据以下原则进行：

1.真实性：文革资料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历史资料，选编的资料，必须是真实的，而不能是文革之后伪造的资料。选编者对收集的资料的真伪应有足够的判断能力。

2.全面性：一般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1976年10月6日结束（当然可以根据每个地区或单位的具体情况，适当前推或后延），且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资料的选编，应涵盖文革的各个阶段。另外对于来源于各个渠道的资料，包括官方和各个群众组织的资料，都应收集编入，尽量做到全面。

3.客观性：资料的收集和选编者，如果是当时某一群众组织的成员，经过长期的反思和沉淀，不应再站在当时组织的立场和观点上，而应客观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避免主观性，不应只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而有意地舍去对自

己观点不利的资料，这样才能给读者提供全面的资料，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4.代表性：文革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虽然很多资料由于遗失或难以查到，现存的资料仍然很多，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选入，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料，所谓代表性资料，就是能够反映当时历史的重要事件和重要组织和人物的资料，特别是能够反映本地区或单位特点的资料，不应遗漏。

5.严肃性：研究文革历史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研究者应该持有严肃的态度。文革资料，包括当时的文件、领导人和群众组织首领的讲话、报纸、大字报、传单、录音、影像等等，其中也有部分内容和文字很不严肃，例如传播谣言、编写绘制一些低俗下流的文字、漫画等，对个人或对立面组织进行人身攻击，这些内容多见于群众组织的小报或大字报，当时就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些内容不应再编入文革历史资料，以免流毒扩散。

二、胡、章《选编》存在的问题

1.《选编》中的资料没有涵盖文革的全过程，没有全面反映北大文革的全貌。众所周知，第一张大字报的起源是北大社教运动，北大文革的序幕也是社教运动，而《选编》却没有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资料，也没有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的背景资料和大字报贴出后的在北大的反应，在工作组时期只有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和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而在工作组进校、校文革成立后和宣传队进校后，对北大广大干部和教师进行打击迫害，设立牛棚、劳改营，批斗“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清理阶级队伍”、逼死人命的资料更是一件没有；对于北大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即从1968年3月28日到7月28日长达四个月的武斗，基本没有一份资料进行反映；在文革期间，北大干部、教师、学生、家属非正常死亡60余人，《选编》中也没有名单和死亡的具体情况。至于在1970年后，学校发生的“一打三反”、清理“516集团”、工农兵上管改，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梁效”的活动，以及鲤鱼洲、653分校的情况也都没有资料反映。所以该资料在全面性和代表性方面是很有欠缺的。

2.胡宗式在文革中是聂元梓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的动态组长，深受重用，他对聂元梓很有感情，聂元梓被判刑和释放后，仍然对聂氏忠心耿耿，他和章

铎发表过多篇美化聂元梓和孙蓬一的文章，2017年，还帮助聂元梓整理出版了《我在文革旋涡中》一书。在他的眼里，聂元梓不是罪人，而是“反王关戚的英雄”。这样的观点也带到了“选编”中，因此很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而是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聂元梓和本派有利的资料就多收集，多选用，对自己一派不利的资料就少收集、少选用，甚至不选用。在《选编》中，大量地选用了一些有关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与潘梓年、吴传启斗争的资料，以证明他们是反对王关戚的。其实聂元梓与潘、吴的斗争只是北大文革中的一个很小的事件，其实质不过是为了争夺北京市权利之间的矛盾，不值得小题大做。而在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活活打死地院附中温家驹、北大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用长矛刺死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这是北大文革中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有“新北大公社”抓捕大量“井冈山”人员和同情“井冈山”的干部群众干部，私设公堂，殴打刑讯，导致樊立勤、邓朴方等人残废，韩琴英（何青）流产，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选编》里却不见踪影。所以，《选编》在客观性方面是严重不足的。

3. 在文革中，有少数人品文品很差的人，为了抹黑对立面组织，编写了一些非常低级下流的文章，用恶毒、丑陋的语言对对方组织和个人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在《选编》中选用了一篇章回体小说形式的《牛山丑史》，其作者署名“新北大公社红七团解牛兵团”，在编者说明里说“《牛山丑史》作于1968年，是文化革命的产物。它以1967-1968年北大广大群众在聂元梓的领导下，同王、关、戚集团进行艰苦斗争为背景写成的章回小说。”在这篇所谓的小说中，用及其卑劣下流的语言，把对方群众骂为“王八”“群蝇”“鳖虾”“混账王八蛋”“爬虫”“狂人”“狂男狂女”等，把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骂为：“魔王”“猴精”“鼠光”“小丑”等，并恶毒地谩骂北大的老干部、老教授戈华、周培源、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林焘、芮沐、张群玉、张侠、白晨曦等，无中生有地说他们中有些人是“托匪”“CC”“残渣”等。对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不幸自杀的沈达力同学，他们非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继续攻击、诽谤和谩骂。在此文中还有很多胡编乱造的东西，例如说牛辉林、侯汉清、樊立勤一起去见洪涛，周培源在家召集部分干部和教授“开黑会”等，把情况说得活灵活现，好像写作者就在现场一样，其实根本就无其事。对于这样的文字，《选

编》只在编者说明中说：“由于《牛山丑史》派性十足，又是小说体，在写回忆文章时不宜直接引用。”但却又说：“一些想写回忆文革的文章，看看《牛山丑史》，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对研究那一时期文学史的人来说，这份资料无疑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在编者看来，这篇东西只是有派性，但还是有价值的。而在笔者看来，这篇丑陋的东西不仅仅是派性的问题，而是缺失人性的问题，文字低级下流，内容虚假，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把这样的东西选用在资料里，只能让人感到编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分不清真实与虚假，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大大地降低影响了《选编》的严肃性。

三、建议《选编》补充一下资料

《选编》作者在编者按中说：“希望在有生之年，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为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及后人提供一点线索和方便，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事实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惨烈教训才能以史为鉴。”对此，笔者是同意的。如果《选编》作者果真要达到这个目的，建议该书编者对以下内容的资料进行补充：

1. 北大社教运动与第一张大字报和文革的关系的资料。
2. 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前后的情况和在北大的反应。
3. 工作组时期对学生左中右划分的有关资料、张承先的有关讲话和检讨。
4. 工作组、校文革和工宣队各个时期被迫害死亡人员的资料。
5. 1966年11月-12月，聂元梓和孙蓬一去上海活动的情况。
6. 1967年初，聂元梓和李敦白等人在广播事业局大楼设立夺权联络站的情况，聂元梓其他单位造反派头头筹备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情况。
7. 校文革时期，在校刊《新北大》上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贺龙、彭真、习仲勋、谭震林、李雪峰等人的有关资料，例如：1967年2月16日第一版至第四版《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1967年3月4日第四版《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1967年3月16日第三版至第四版《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一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是文革中最早反对朱总司令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8. 《新北大》上批判老“井冈山”“红联军”和“虎山行”的文章；如《新北大》1967年2月1日第一版到第四版“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头目的丑恶嘴脸”等。
9.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打击迫害北大干部、教师的有关资料；包括批判陆平、翦伯赞、冯定、戈华、冯友兰、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傅鹰、陈守一、魏建功、王力、游国恩、杨勋、孔繁、杨克明、郝斌以及把历史系部分教师打成“国民党杂牌军”的资料（《新北大》1968年5月8日第四版）。
10.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群众组织和学生的有关资料，如：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公布《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第二号公告》，第四版《北大井冈山一反革命分子大本营》，1968年7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1968年7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我校首次公审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泰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等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1968年6月14日第四版，刊登《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反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把化学系1963级学生樊能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11. 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打死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本校学生殷文杰、刘玮的有关情况和宣传队进校后追查处理凶手的有关情况。
12. 校文革掌权时期把大量干部、教师关入“牛棚”、劳改大院进行劳改和虐待的情况，以及抄家、强占老干部、老教授住房的情况。
13. 校文革掌权时期对北大部分干部、教师、学生进行非法抓捕的情况，包括对杨勋、杨炳章、魏秀芬、杨作森、乔兼武、谢世扬、何维凌、胡定国、戈华、苏士文、王晓秋、樊立勤、邓朴方、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韩琴英（何青）、彭秋和、郭青苔、俞小平、周国平、王解南等，以及在丰台火车站利用假电报诱捕肖正贵、俎栋林、马国勋等人的情况。
14.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吹捧和谄媚江青的有关资料，如《新北大》1968

年3月27日第三版《革命的硬骨头，毛主席的好战友——学习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三版本刊通讯员文章《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叫他人头落地》，1968年7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江青同志赞》，1968年7月5日《新北大》歌颂江青专辑，发表社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二版《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等。

15. 文革时期有关北大汉中653分校和江西鲤鱼洲情况的资料。
16. 1969年初8341部队进入北大后，毛泽东对于北大校文革的评价和有关北大的指示，见于谢静宜1969年5月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197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委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报告（中发1970年17号文件）以及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17. 宣传队掌权时期（1968年8月19日-1976年10月）北大文革情况，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516集团、工农兵学员招生和教学情况，周总理对北大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梁效的活动及四人帮覆灭在北大引起的反应等。

最后说一句：《新北大》是北大的校刊，从1966年8月17日到1968年8月18日，出版过201期，是北大文革前两年各项活动的记录，也是研究北大文革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果《华忆出版社》能够将其全部制成为电子版或纸质版，提供给读者，将会给文革历史的研究提供很大方便，其善莫大焉。

【书评】

历史的见证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读后

孙月才

这是第一部关于北京大学文革历史的资料选编，估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将是唯一的一部。两位编者都是北京大学老五届的学生，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他们了解文革的全过程，熟悉文革主体阶段发生在北京大学的种种情事

和人物，他们是编辑这套书的最佳人选。

与回忆录和评论文章相比，编纂资料有特殊的困难，对编者有特殊的要求。首先，它要求编者有志向，有操守。不慕安逸养生，不计安危荣辱。以此为人生最高的事业，像古人说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次，它要求编者要有恒心，有毅力，远离尘世的热闹和虚荣，以“咬菜根”的精神，甘愿坐冷板凳，与寂寞孤冷为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它还要求编者有巨大的耐心和敏锐的眼光，从互联网上，在故纸堆里，搜寻、购买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把有用的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入电脑。然后一字一个字地编辑校对，孜孜矻矻，集腋成裘。

这部资料选编所搜集的资料相当全面，其中有许多资料难得一见。它为当代和后人研究北大文革乃至整个文革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研究文革，资料的可靠和全面是第一位的。

任何一部资料集，总会有所不足。下面我将阅读该集觉得有待改进处约略说一说，仅供参考。

一、资料是供当代及后代人研究文革史用的，他们对北大文革的始末未必了解，而你俩的资料集应该是独立自足的，即仅通过这个资料即可对北大文革有一个系统的、内容翔实的覆盖。所以“编者按”中应有一个对北大文革发展过程简单介绍，可以对阅读资料起到导引的作用。不仅应该有一个总的导引式的“编者按”，“集”中一些关键性资料，在北大文革发展中起到转折作用的资料，都应有“编者按”。如毛主席 7.28 召见讲话，是红卫兵运动的重大转折，你不指出这一点，后人未必明白。即使孙蓬一等人的“1.27”大字报也应有个按语，大字报引发全校大批判，大批判后，也就意味着北大群众运动从此终结。

众多资料是按北大文革发展过程的先后程序来排列，线索分明。当时领导人的讲话也应这一原则来排列。《下册》第 324 页的江青讲话可列入第 15 页陈伯达、康生讲话之前，他们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讲的，理应放在一起，加深这些“首长”如何“指导”北大运动的印象。

二、从资料的完整性看，似应把北大的社教运动、国际饭店会议列入其中。这个资料可取聂元梓的回忆录，这是北大文革的预幕。还应取“5.25”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当时李雪峰的讲话，这是北大文革的真正开端，从资料集的“独

立自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7.28”召见讲话，你们录有韩爱晶记录，由于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不妨把聂在回忆录中的记录一并收入，不管“同”与“不同”，这种对比是很有意义的。

三、孙蓬一的“来信”很有意义，是否应增加孙蓬一的《刑事判决书》，加个按语，说明孙出狱后的遭遇及其生卒年。聂也应有《判决书》及其生卒年。他们两个是北大文革的重要人物，《判决书》是他们的文革结局：两个都是冤案，极有研究价值。

四、不要把《牛山丑史》夹在聂孙材料之间。“丑史”文体特殊，可作“附录”收入。

还有一些小意见，无关紧要，瑕不掩瑜。期待着更出色的研究成果问世。

顾炎武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两位编者都是年近八旬之人，他们从古稀之前开始，以日渐衰老之身，成世人难成之事。为汲取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训，不惮十年磨杵的土功夫，以如此丰厚的成果，回应历史，回馈社会，回报母校。北大应该为有这样的学生骄傲，北大人应该以有这样的校友为荣。👍

2020.7.20

【书评】

追求真相 严谨治学

——简评胡宗式、章铎合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

曹之亮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之时算起，至今已过去了50多个年头。当年在北大就读的青年学生，个个充满理想和热情，几乎无一例外地亲身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间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有的仍似历历在目；但也留有不少难以解释的谜团。

北大，是毛泽东主席亲树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源地，北大的文革动态，自始至终受到中央高层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北大的文革运动，与全国文革不可分割；且对于全国文革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胡宗式、章铎合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华忆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难得的系统性地记载北大文革历史的巨部头著作。全书字数达100万，内含大量未曾披露的各种当年文革的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系两位编者毕生致力收集所得，足显珍贵。正是由于这些资料的原始属性，本书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

在本书的取材方面，对于文革期间已见之于官方报端或央视的公开披露信息，编者除给予以必要的交代外，也予以简化处理。这可能也合乎多数学术界学人以及出版界的要求。

本书编者表示将会乐意听取各方面的读者对于本书的批评和建议，这是一种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了编者追求真理和真相的严谨治学精神。❏

2020.8.6

【书评】

对《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的几点考证

樊能廷

北大校友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包含各方面信息，平心而论，辑录工作很费工夫和心力。他们在“封底”特意做了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资料说的都是事实，在那个特殊年代，无论哪派，虚假的宣传都是很多的。我们把它们列在这里，一是这些资料有的是孤本了，弃之可惜；二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线索，请研究者在使用时勘验考证。”

对于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的全部文字，进行勘验考证，既没必要，也不可能——人家明告诉你是“选编”么——书是任其选，任其编的。

笔者也是北大文革的过来人，近年做了一些北大文革史的研究工作，多多少少知道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重视和着力研究的这个历史阶段的用心，结合实际发生在北大的若干情况，也就有了一点“勘验考证”的能力。

在此，对几个大关节有明显的出入的问题研究考证一下：

一、关于1967年1月3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

地点都是人民大会堂，人物却有变换——

刊载于1967年3月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四)》第3页开始的文本，是2400字。“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等同志接见了北大聂元梓、夏剑豸、姜同光、刘冲、于贵南等同志。”

到了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下册第38页开始的文本，却只有1800余字。参加接见人员：陈伯达、江青、康生、杨成武等。北大代表：聂元梓、夏××等五位同志。

瞧瞧，接见人里边王力不见了，被接见人里边“剑豸、姜同光、刘冲、于贵南”不见了。胡宗式、章铎是否在刻意隐瞒什么？

二、关于“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

2018年樊能廷出版《北大文革简史》，在第8章曾经写道：江青是“新北大公社”的“保育员”，对于“新北大公社”有阿保劬劳，但“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这句话至今来路不明。

现在，头绪渐渐清楚了。先看有文字可考的材料：

①1967年11月22日，校刊《新北大》第136期：……中央首长不止一次地说，“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组织”，这就给了那些污蔑“新北大公社是全国老保势力大本营”的家伙当头一棒。

这时候，语气还含混，说是“中央首长不止一次地说”。

②1968年7月26日校刊《新北大》第196期，第一版，聶元梓、孙蓬一审阅的本报编辑部《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当王关戚反党集团疯狂围攻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江青同志支持我们说：“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

此处语气很坚定——“江青同志支持我们说”。

③《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册《牛山丑史》第424~425页：九月二日上午，新北大革命师生齐集在大饭厅，传达了江青同志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的讲话。江青同志在这次讲话中，宣判了关王的死刑，郑重肯定了“新北大公社

是个很好的组织”，给那些想搞垮这个革命组织的家伙当头一棒。她严肃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公社战士听到这些鼓舞的话，得到这么大的支持，无不热泪盈眶，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大饭厅里万头攒动，外边人山人海，口号声，欢呼声，犹如江涛海啸，奔腾蓬勃。

此处语气很更坚定——“（江青）郑重肯定了”。

④《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册第135页新北大公社数力系62级扬子浪（谢定国）《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戚本禹在中央文革作了两次检查，均未通过。（这是三军告诉我们的）最近在人民日报社，戚本禹说“新北大公社是个较好的组织”，陈伯达纠正说“是个很好的组织”。戚又说“它的战士革命性很强，他们保聂元梓，不是保她的缺点错误，不是她个人，是为了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到这个时候笔者才明白——“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这句话，出自戚本禹和陈伯达，而不是出自江青口中！

这么着，解开了“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出处的谜团。

三、关于“‘红旗飘’里准有坏人”

1968年4月18日《新北大》167期，第三版，新北大公社革命工人兵团、红旗兵团《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评井冈山兵团的反动政治纲领》说：江青同志指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可是井冈山兵团中的这伙反革命小丑，却明目张胆地对抗江青同志，狂叫什么：“红旗飘里都是红卫兵，说有坏人，没人相信！”江青同志指出：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革命群众组织，不能垮！”可是井冈山兵团中的这伙反革命小丑，却明目张胆地对抗江青同志……

拙著《北大文革简史·第九章 聂元梓“校文革”上揪下扫》第七节“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考——江青讲话的三个版本——

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2008版）记载：（1967年）5月22日，“红旗飘”成立，该组织原名“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本年2月份即开始活动，其核心组成员有牛辉林等五人。8月17日，井、红、团、零、飘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标志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

9月1日，“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草创之初，聂派传出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说“（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

江青说“红旗飘”里有坏人，还点了牛辉林的名。聂派媒体以此为尚方宝剑，对牛辉林和反聂派进行了经年累月的攻击。历经“文革”十年浩劫，水落石出——牛辉林根本不是坏人，“红旗飘”里一个坏人也没有！相反，江青、聂元梓是举世皆知的坏人，北大聂氏“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今天重读昔日聂派校刊《新北大》那些满带“秋风扫落叶”语言暴力的凶狠刻毒文字，疑问不由升起在笔者的心头——江青有时候说话，嘴上缺把门儿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江青讲话，关于北大“红旗飘”和“牛辉林”到底是怎么讲的？

找寻年逾九旬、素无交往的王学珍或者聂元梓访谈、核准，都不大可能了，尽管他们说过或写过“‘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现在，本文提供三种版本的《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供读者一阅。需要指明，这三个版本中，没有江青讲的“准有”。这三个版本中“红旗飘里有坏人？”都带问号。三个版本都没有江青讲“新北大公社是个很好的群众组织”，也没有“牛辉林说我的坏话”。显然，聂氏“校文革”和聂派处心积虑的窜改、喧嚷，包藏祸心，自不待言了。幸运的是，第三个版本的文字，来自聂元梓大篇长什的新著《我在文革漩涡中》，第532页，没有“‘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这句话，这就如同笔者跟聂元梓当面核准一样的有效。

《北斗星》原为“中国科学院北斗星编辑部”署名主办，到1967年6月30日，刊出第94期。从7月1日第95期开始，由“北斗星战斗队”署名主办，不久，复名为“北斗星编辑部”。

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记述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不知源自何处。

文革期间，一篇“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记录成为多少个版本，各个版本又衍生出多少种说法，简直难以尽数。聂氏“校文革”和聂派势力言之凿凿、大肆喧嚷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流毒甚广。五十年暑往寒来，人们对于这个“准”字，熟视无睹，没人质疑，没有人下力气去寻找真相，本文初步探索它，还历史以真实。

众所周知，江青和“中央文革”是北大聂氏“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

的坚强后台，是他们的保育员，他们双方直白的互爱，从不掩饰。江青说“红旗飘里有坏人？”经过聂派阴鸷狠毒的窜改，成为“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在江青身居高位、一言定人生杀的时代，就是借刀杀人！可见，在江青和聂元梓互相利用的过程中，聂没少干这一类“欺君罔上”的事情。

近日笔者辗转查阅到江青讲话的三个版本，作为附件展示众人、考究于众人。笔者期盼读到其他的版本的《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以便明了王学珍、聂元梓、“北斗星编辑部”和“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哪一家的记录更接近真实。

附件 1: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1967年9月4日，《北斗星》第150期，第3页

谢副总理：今天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先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同志们、小将们，好久不见了。有的可能见过。你们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的也很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不对的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这时期看了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一些看法。上次在在那个也地方说过，对形势的看法，可能和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一样。目前看来可能有一部分人还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也不少。可能有人说，江青这个人就会说形势大好，确实很好嘛！昨天接见了四川的同志，四川的形势就是很好嘛。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难道越来越坏了？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你们要注意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五·一六”兵团，他们以极左面目出现，要小心提高警惕。对形势的看法不一样，什么“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我曾驳过这种论调，武斗就先进吗？难道我们搞大联合、大批判，就是落后吗？我们认为北京应带头搞大批判大联合，搞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里去？北航的同志来了吗？韩爱晶同志来吗？不是叫你们两个单位搞试点吗？北航你们还在搞吗？师大你们还在搞吗？你们要坚持下去，不要怕别人说你们右倾。全北京都应该试，把本单位的斗批改都进行起来，从各条战线把他们的一

系列政治纲领批深批臭，批的比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这个工作很艰苦，是很光荣的任务。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能代替你们。这是最光荣的任务。包括工厂、农村。工厂农村，不要因为斗批改停产。由于背离了这个大方向，一小部分坏人利用青年人这种无政府主义把北京也打个稀巴烂，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又搞起一个大串联，我们怎么说也不听，犯了错误也不管。中央现在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你们也不配合，相反增加了麻烦。这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人煽动，你们的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军内的“一小撮”、对准革命委员会，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没有军队有我们没有？要相信我们这个军队，固然军内有少数个别是坏的，但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抢枪、打人，都不还手，这是中央下了死命令。世界上哪有过这样的军队？这是有阴谋的，这是想把野战军搞乱了，敌人打来了怎么办？象陈再道、赵永夫这样的人实在少有。赵永夫是派进来的。你们也不管是哪个军队，不管是犯了一点错误，就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不管是哪里的，都是共产党员。赵永夫冒充共产党员嘛！同志们好好想想，打乱了我们的军队，就是自毁长城，自毁长城。我们军队的一些老干部说了些错话，做一些错事，一旦打起仗来他们是很勇敢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对他们也斗争，什么喷气式，我们向来是反对的。不是说军队有错误不该批评，而是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拿这个口号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的，想打乱我们的革命阵营。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国家保卫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柱石。正规军的战士连枪都被夺走了。我要是战士就要开枪，当然开枪是不对了。要广泛宣传不要夺枪。第二就是对准革命委员会，他们只是犯了些错误，做了些错事。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一有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委会，对准人民的子弟兵。谁要是对准这两个，他就错了。提出口号的人不一定是坏人，改过来了就好了，还是先进的北京。就是要搞大批判，搞大联合，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把那些挑起武斗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北京又乱冲了，四、五百人冲了中南海。现在再重申几个问题，去年在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的会上也讲了，要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公安部、外交部、大使馆。怎么钻到大使馆里面去了？

这是国际惯例。我们在国外也有使馆。到英国代办处，搞得我们十几个人也伤了。对外国轮船也抢，连援越物资也抢。这不是左派，一定有坏人挑动。国防部不准冲，京西宾馆不能冲。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昨天光明日报被抄了，把所有资料抢了个空，不知道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要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周总理：卫戍区的同志们在吧，马上派人去查清楚是谁抄的。）你们一来就抄，中央处理问题还是要调查的。必须把这一股风压下去。把打砸抢抄抓这一股风煞下去。西单商场的肇事的头头就要抓起来，这是刑事犯，专政要照常进行嘛！西山一些重要场所不要去。有的人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就这样干。人家就是利用你们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光去革人家的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革自己头脑里坏思想的命。你们做自我批评就象挤牙膏，不做自我批评，又不给人家做自我批评的机会。

我讲一讲聂元梓同志，我上次批评她，是批评她的缺点错误。好的就支持，坏的就批评，对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立了两大功，我们不会忘。一是参加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二是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但就背上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她机会。那个红旗飘里有点坏人？那天那个讲话的牛辉林不是很高明，受人家的命干了。聂元梓把包袱丢了——我们记得你的功。你自己不应该记功。聂元梓就是不断地吃老本，做了不少坏事，躲躲闪闪，连她这个组织也快垮了。聂元梓的那个助手不好——孙蓬一是个坏人，出了不少坏点子。对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也要小范围讲，与人为善，惩前毖后。聂元梓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希望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决不要自己把功记起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就讲这些，不对，你们可以炮轰、火烧。

附件 2: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1967年9月1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人和北京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参加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

谢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笑）。我这一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可能有分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闹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青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不说你们全体，而是说部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

烂好不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动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的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

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

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附件 3: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第 532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

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

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附件 4: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下册，第189页

那个叫什么“红旗飘”的，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并不是因为他说了我的坏话才这样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

为了节省篇幅，关于江青说牛辉林这段话，以上只引用胡宗式、章铎《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下册）寥寥五十余字。

《北斗星》版、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版、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版，三种版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中，都没有““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这个说法。

时至今日，独独胡宗式、章铎把江青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死死扣定在牛辉林的头上。为他们设立“红旗飘”专案组，抓捕、设局诱捕“红旗飘”成员，非法关押，残酷逼供开脱责任。武斗期间，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被聂氏“校文革”派出武斗队人员从黑龙江老家抓回北大，严刑逼供，打断腿，写下《认罪书》，用大箩筐抬着上台批斗，《认罪书》登在校刊《新北大》上。

胡宗式、章铎编造江青讲话“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至今还在竭力传播），其目的正是为他们“文革”期间一直借江青话语打压、陷害反对派的种种恶行开脱历史责任。

以上仅对胡宗式、章铎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略的研究考证，待笔者有时间时再全面地对该书进行评价。❏

【资料】

陆平在哲学系教职员党员整风会议上的发言

1965.12.30

讨论历史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做好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方法。肯定一切或是否定一切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离开这样的目的，陷于争论是你正确还是我正确，就不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把事情办好，就是无原则斗争。

社会主义大学为什么要办哲学系？哲学系是干什么的？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系？这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弄不清这个问题，不可能总结好经验。

国民党旧大学、资本主义大学、修正主义大学都办哲学系，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服务的。

社会主义大学办哲学系，绝不是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绝不是为了培养修正主义分子的。我们是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学习哲学就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反帝、反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办哲学系的目的，哲学系的任务，就是这样的。要办这样的哲学系，就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必须有党性最强的干部和教师队伍。哲学系必须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最坚强的阵地，必须是反修的战斗堡垒。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和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北大哲学系是不是办成这样了？没有，而是差距很大，问题很多。哲学系没办好，首先是党委的责任。为什么没有办好？需要总结历史的主要经验教训。因此才要讨论历史问题。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有必要扼要地回顾一下哲学系的历史情况。

一、从院系调整到反右派时期

旧北大的哲学系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哲学阵地，旧的势力和传统是相

当强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造。1952年末，1953年初，进行了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进行了一次教学改革。

这个时期哲学系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员有了一些发展，建立了党的总支；对师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了肃反运动，初步清理了队伍；参加了对胡适和梁漱溟的批判；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培养了一些青年教师，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马列主义课程正式纳入了教学计划。

但这个时期在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办系方向不明，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进行必要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哲学系的面貌没有多少变化。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但系的领导有严重右倾的错误。

哲学系工作上的这些缺点错误，学校党委应负主要责任。当时学校党委的领导思想上是有右倾的错误的。这在学校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做过了总结。

1954年来了苏联专家，搬来了苏联大学的“框框”，带来了教条主义，也还有修正主义。

为了集中老教师进行思想改造，随着院系调整调来了一大批资产阶级老教师，使哲学系成为北大老教师最多的单位。这些人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首屈一指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大师冯友兰，有直接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知识分子，如桑灿南，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如沈乃璋，等等。他们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来办系的。我们和他们之间从来就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

首先在教育方针上，以冯友兰为代表提出“分工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挂帅；而要由资产阶级教授领导，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挂帅。这种主张当时不仅在党外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在党内也有许多人赞成的。系的主要党员领导干部汪子嵩同志，也认为在学校里搞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联系实际，只能联系一些自然科学。搞历史唯物主义很困难，许多基本问题马、恩、列、斯都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有党中央。因此，他也认为北大哲学系主要应该搞哲学史、逻辑学。他和冯友兰、资产阶级教授“分工论”的主张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这种错误指导思想之下，自然不能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斗争。他也没有积极地去建设马列主义哲学系的阵地和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以致在1958年以前，自己还不能开历史唯物主义课。本来在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占上风，我们又很少作斗争，加上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结果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一时造成学生不愿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兴趣反在于唯心主义；羡慕崇拜资产阶级教授，甚至有的学生抱着这样的志愿：一生只要学到半个冯友兰也就心满意足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哲学系学生中出了那么多的右派，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学术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也是尖锐的。1954年下半年全国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胡适进行了批判，1955年批判梁漱溟。北大的一些中青年教师写了文章，许多教师参加了斗争。这一工作是有成绩的。1956年、1957年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在国内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前夕，资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冯友兰宣扬他的“抽象继承法”，郑昕也要求开放唯心主义，并要吸取唯心主义的好东西。他们就是利用向科学进军和百家争鸣的口号在学术领域里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反对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对于资产阶级这次在学术领域向我们的进攻，学校党委、哲学系的同志都是缺乏认识的，没有及时进行斗争，予以还击。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影响到党内，党员的思想混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比较普遍的只愿钻业务，不愿做政治工作，有些人闹待遇，闹地位。在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面前，汪子嵩同志表现严重右倾，他在1957年1月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的表现可以证明。

从哲学系党的领导方面来看，当时党员很少，力量薄弱。支部以及后来的总支，只进行了一般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党的组织生活。系的领导是“秘书专政”。汪子嵩同志负责领导系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他很少与党组织商量问题，又不大尊重党组织的意见，而是个人说了算。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并未实现。

二、1957年反右派到1961年调整开始的时期

反右派斗争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的一场极为尖锐的政治斗争。哲学系的反右派斗争，取得很大的成绩。学生中放得好，反得彻底，挖出许多大右派。但在教职员中，放得差，反的也差。后来虽然进行了补课，但已丧失时机。按哲学

系的实际情况，有一些教师本来是右派，但因放得不够，划不上右派，实际上保留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阵地，留下了祸根。平时他们采取渗透办法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形势一有变化，就出来和我们进行斗争。他们也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缩一缩，叫我们抓不到他们是右派。反右派斗争中的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学校党委负责。但哲学系总支也有应负的责任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央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接着公布了教育方针。全国各条战线包括教育战线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

哲学系师生，经过反右派，提高了觉悟，受到了总路线、教育方针的鼓舞，迫切要求进行教育革命。1958年至1960年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哲学系同全校一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经过了红专辩论，教育方针大辩论，开始明确了办系的方向，积极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

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教学改革口号下，突出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调整了教学计划，组织师生动手编写新的教科书，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

1958年秋到1959年，进行了半工半读的试验。这是冲破旧大学框框的革命的尝试。还开展了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和在群众中普及哲学的活动。

所有这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兴无灭资的旗帜是鲜明的。通过这些工作，知识分子劳动化有了一个开端。师生的政治思想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有所加强。青年教师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较快，加强了教学科研的新生力量。老教师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在哲学系，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有了相当的发展。

对于这个时期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对这次教育革命的深远意义也应充分估计。我们在办系的方向上，开始真正走毛泽东思想的路，摸索到一些经验，锻炼了队伍。

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哲学系总支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工作是有成绩的。

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是工作不扎实、不深入、不细致、大轰大嗡、简单粗糙，还有浮夸的现象。政治思想工作有简单化的毛病，在党内外搞了一些过火的批判，挫伤了一些人的积极性。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合作有缺点。

从总支领导来说，在取得一些成绩以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脱离群众，不民主的作风有了发展。

对于这一时期的缺点错误，也应该有足够的认识，才能真正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的教育革命，无论看它的成绩和缺点错误，都需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条件。通过反右派斗争和双反运动，我们认识到按照原来的“框框”办学校是不行了，必须在学校中树立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促使他们逐步劳动化，改变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的状况，破除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解放思想，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把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切实加强起来。因此我们进行教育革命是坚决的。但是我们这时对思想意识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认识还很不够。1960年经过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我们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只是开始有所认识，对于苏联高等教育实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还没有认识。因此我们还不可能从反修防修的深远意义上来认识学校的教育革命，也没有提出要破苏联“框框”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少。

就以半工半读试验来说，当时没有能认真总结经验坚持下去，就与我们对它的意义认识不深刻、不是彻底搞清楚了有关。一方面师生参加了劳动，一方面教学还没有彻底改革，没有下决心解决课程设置过多的问题，这就势必发生矛盾。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后就潦草收兵了。后来在如何估计这次试验的问题上，党内外思想分歧。1961年以后，师生中许多人认为这次试验是“吃了亏”，做了“试验的牺牲品”，“劳动搞多了”等等。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再以社会调查来说，黄庄调查基本上是个好经验，通过调查，师生受到了三面红旗的教育，也学习了怎样进行社会调查。当然也有缺点，如调查报告中对当时五风的影响认识不足，反映不够。学校肯定了 this 经验，把调查研究列入了哲学、经济两系的教学计划内。但在1961年下半年以后，哲学系没有执行

这一条，学校也没有检查督促。所以在这方面最大的缺点错误是没有把社会调查坚持下去，这说明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认识还是很不深刻的。

三、从1961年调整到整风社教前的时期

1961年到1962年十中全会以前，哲学系执行了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高校六十条，进行了调整工作，对前一时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纠正。

十中全会以后，加强了反修教育和阶级教育，进行了五反运动，组织师生参加农村四清，初步贯彻了主席、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

这一段工作是有成绩的。也发生了许多缺点错误。

先看一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

1961年、1962年，国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进一步掀起反华高潮，国内外敌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在哲学系党内外是有影响的。有些人对三面红旗发生怀疑、动摇，有些人在困难面前，精神不振作。有的反动学生也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又有一次反复，他们还通过教学、研究、指导研究生、助教，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同我们进行争夺青年的斗争。

如冯友兰提出了“普遍形式”问题，在课堂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者，拉拢庄瑛、周先庚开家庭展览会。心专老教师强调学习苏联心理学与我对抗。

在青年教师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有滋长。思想改造放松了。许多人不愿下乡参加劳动。不愿担负社会工作、行政工作，只愿意进修，搞科研，教学工作也挑挑拣拣。

阶级斗争在党内也有所反映，从1961年末开始，哲学系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严重的不团结现象，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这个时期，学校党委在纠“左”以后，思想上产生右倾，在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缺点错误（这在党委的检查中讲过了），这些对哲学系工作有很大影响。对哲学系党内分歧，长期没有解决好，党委也有重要的责任。

从系总支的领导来讲，存在几个主要问题：

（1）对阶级斗争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的不高，没有抓

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在党内外加强兴无灭资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教学、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抓的更少。没有进一步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对介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课程，没有检查，没有引导师生进行批判；对老教师培养研究生、青年教师的工作也很少过问。

(2) 对 1958 年到 1960 年哲学系教育革命的经验没有认真总结，没有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因此好的经验没有巩固、发扬，坚持下去，缺点错误也没有很好吸取教训。教学工作、师资培养的有些方面又走了回头路。

(3) 没有把党管好，长期以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思想混乱，闹不团结，不能得到解决。有的总支领导干部本身在思想意识、作风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没有把哲学系的党员队伍带好。

回顾解放以后十几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

在哲学系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在思想意识领域内，敌情是严重的，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紧紧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要办好哲学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走毛主席指出的半工半读的道路，这是哲学系的根本问题。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1958 年以后大进了一步，摸索了一些经验，但认识还是很不深刻、不明确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很好地学习与理解主席的思想，提高认识。

建设一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团结的党，是办好哲学系的根本关键。这些年来，哲学系的一条最严重的教训是没有把党建设好。哲学系的同志都应该站得高些，跳出具体的是非争论和无原则斗争的圈子，真正抓住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共同为办好哲学系而斗争。

什么是哲学系的大是大非？哲学系主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什么？哲学系的大是大非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应是首要的大是大非。哲学系的整风、社教，抓大是大非，就应该抓这些，总结历史经验也要从这些入手。

认为王庆淑问题是哲学系的大是大非，或是认为一部分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哲学系的大是大非，都是错误的。有这种看法的同志多数是认识不清，

如顽固地坚持这种观点，很难说不是宗派情绪。

在社教运动中，张磐石同志并没有抓住哲学系的大是大非。他抓的是哲学系的一些具体工作中的是非和无原则斗争，把这些硬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高度上去，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使运动走上了邪路。不但未解决哲学系的问题，反而加深了矛盾。运动是有成绩的，彭真同志说：好就好在乱上，充分揭露了矛盾。使我们对阶级斗争、工作中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

哲学系的斗争是严重的，工作中有许多缺点错误。从历史来看，有什么主要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向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大破资本主义和苏联的教育“框框”，彻底进行教育革命，逐步实行半工半读，走自己的道路。

北大哲学系有资本主义大学的“框框”，有苏联大学的“框框”。经过了十五年来看，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这些旧“框框”对我们的束缚还是很大的，没有根本破除。需要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哲学系。

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哲学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培养象主席指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哲学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反修、防修的根本问题。

哲学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既然要成为“劳动者”就是要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既能作教师、专家，又能作工人、农民。今后，我们国家对毕业生只能包工作，不能包做干部。

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和这个要求是大有距离的。他们是只愿从事脑力劳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向上作教师、科学工作者、做专家，分配到县以下的地方工作都难办到。更谈不到做工人、农民，是只能为官不能为民。这样下去，难保不出成批的修正主义。怎么能够反修、防修？苏联的教训，要引以为戒。无论老革命、新革命，如果长期养尊处优不参加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都有蜕化变质、成为修正主义的危险。

从哲学系的历史发展情况检查：

1958年以前，是以培养专家为目标的。

1958年教育革命时期，大家都以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为目标。但在思想上、工作上都未具体落实。是不是做“普通劳动者”，有很大争论。

1961年以后，是以培养教师和哲学工作者为目标的。

可见，哲学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说明校、系的领导思想对反修、防修的深远意义认识还不够，对于学校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严重斗争认识不够，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对我们还有不少影响。但是现在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从十中全会以来，主席中央对教育工作有了一系列新的指示，又经过城乡四清运动，重新教育人，我们应该觉悟了，对反修、防修的深远意义，对学校里严重的阶级斗争，应该认识清楚了。如再不认识，现在再继续那样去干，那实际上不就是相信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武器。搞哲学的人必须解决共产主义世界观，无产阶级党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系的根本问题。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书念的再多，也没用处。我们教育中的毛病就是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工农结合太少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太少了。怎样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样才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哲学？

马列主义哲学不是教条，从书本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哲学不是第一，第一是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不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不搞阶级斗争，不与工农兵结合，不能改造世界观，还搞什么哲学？

主席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话中说：“……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

1964年春节主席就指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讲授不甚得法，考试办法

对学生实行突然袭击，学生负担过重等缺点错误。他还指示，课程要砍掉一半；马列主义念几十本就够了，多了没有用处；书念多了要害死人；特别指出，哲学要搬出课堂；大学文科教师、学生、行政人员通通要下农村、工厂，搞阶级斗争。1964年中央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今后学校的方向是半工半读，指出这是反修、防修的三项根本措施之一（一项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项是干部参加劳动，一项就是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对于半工半读的深远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这是培养又能作体力劳动又能作脑力劳动的新人，根本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将来完全消灭三个差别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的，这是努力促进文化革命，逐步消灭三个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情。主席教导知识分子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到工农中去，这靠一年下去一个月是不行的，而实行半工半读就可以更好地实行与工农结合。

去年11月，中央指示文科要实行半工半读。因为我们正在搞社教运动，这件事已经拖下来了，对主席、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新的指示，从全校看学习得很不够，贯彻执行得也很不够。我们都喊拥护毛泽东思想，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没有真正跟上来，也没有积极行动起来。

以中央、主席的指示来检查我们哲学系的工作，差距是很大的。现行的一套办法，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影响，没有完全突破旧的框子。学制五年，读几十门课，学习方法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参加劳动、阶级斗争又那么少，很少到工农兵中去，也很少参加学术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这套办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是不能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是不能真正学懂马列主义哲学的，是难保不出修正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彻底破除旧框子。必须走毛泽东思想的路，搞我们自己的一套办法。现行的办法是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要彻底进行教育革命，首先要求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进行思想革命。坚决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彻底决裂，彻底划清界限，不能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不承认自己身上有资产阶级思想，怕革自己的命。谁也不能摆脱历史和现实条件，我们每个人都有或

多或少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几年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对反修、防修的深远意义认识不够，现在有了认识，就应该起来自觉革命，站在思想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最前线。

现在的形势逼人，命是非革不行。谁不自觉革命、真正的革命，就领导不了今后的工作，也当不了教师，就要从革命的队伍中掉下去。

第二，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反修为纲，积极开展学术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

要彻底改造文科，必须走半工半读的道路，这是为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找到了一条具体途径。但是在学术领域里，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兴无灭资，还必须正确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批判，坚持进行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样才能繁荣学术，巩固、扩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改造和锻炼马列主义的理论队伍。

长期以来学校党委、哲学系总支对学术领域的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深刻意义，认识得很不够，没有认真抓这方面的工作，领导薄弱，没有引导大家积极参与这方面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特别是1963年底学部会议提出了以反修为纲以后，我们虽然在贯彻学部会议精神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对这个精神认识得还是很不深刻，没有真正抓住活思想，解决党内外思想认识问题，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工作上落实。

从哲学系来看，1960年以前，还有领导地参加了一些学术批判。1961年以后，有领导地参加学术批判就很少了。就以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为例，除个别同志积极参加了写批判文章以外，从整个系来看，参加得很不够。这件事党委有责任，系总支也有责任。党委没有抓住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系总支是不是抓住了？每个党员教师也要想一想，自己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不是积极地参加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感兴趣，不积极不主动，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需要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解放以后十几年了，在哲学系的教学、学术阵地上，到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占领了多少阵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有多少阵地！这是值得深入检查、深刻想想的。

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大师冯友兰，还有

国内第一流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决不要看见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过去几年学校党委因此吃过大亏。在哲学系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严重斗争，解放十多年来，哲学系在这方面的斗争到底怎样？总的看来是斗争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是和平共处。冯友兰在这里十五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他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批判，1958年批判了一次，只是一个开端，还是极不彻底的。远的不说，就拿1962年到1964年的讲义中发现的问题来看，问题也是严重的。如冯友兰公开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提出什么“死无对证”的历史观，反对古为今用；在“强调客观”的幌子下宣扬封建主义；还宣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调和论。宗白华宣扬“镂金错采的美学”和“初日芙蓉的美”是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的两种美学理想，抹煞了美学史中的两条道路斗争。朱伯昆说“奴隶主是勤劳勿逸，爱护奴隶的善人”，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等等。这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均未受到批判。

在我们哲学系还有系统的修正主义的冯定。学校党委长期未发现他的修正主义，叫他领导哲学系十年来，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主要的错误是：

一是认为他是老干部、党员哲学家，就盲目信任他，让他领导全校理论工作，领导哲学系，许多重要报告让他作，对他的工作不检查，使工作受到损失。

一是不深入教学，不看教材、讲义，不看学术著作，因此不能发现他的问题，甚至还在校刊上错误地介绍了他的教学经验。

1960年在高级党校对他进行批评后，我们也没有引起足够警惕，追查下去，说明我们的政治嗅觉也是不灵的。

二是对于他一贯工作不负责任，精神不振，虽然早有察觉，也没有进行严格的批评，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放松了党组织对他的监督。

哲学系的党员同志，中青年教师，多半都是由苏联专家、还有冯定培养的。当然不能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冯定是修正主义，跟他们学习过的人也是修正主义。但是很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到底有多少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哲学？受了修正主义的影响没有？在思想上是不是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界限都清楚？

第三，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方针，首先要

求领导干部劳动化、革命化。

要彻底进行教育革命，逐步实行半工半读，使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要求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带头劳动化、革命化。否则是办不到的。

从学校领导来讲，领导干部带头劳动化、革命化是很不够的。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革命精神有所减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的很差，参加体力劳动，到工农群众中去也很少。往往是越是领导干部，越下不去，学校是这样，系里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很不对的，从长远来看，对培养革命接班人也是很不利。

在培养师资队伍方面，学校和系做了不少工作，总的看来，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坚定地按照党的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方向，坚持在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培养教师，这是一个很大的经验教训。1958年到1960年搞了一些，1961年以后没有坚持下去。

哲学系的党员同志在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怎么样？能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要求？

我看每个同志都应该拿“九评”中，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对照一下自己，检查一下自己。

首先，我们是不是够得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三面红旗是不是坚定，高举？还是有过动摇和怀疑？当时社会上三风，就不能不反映到党内，不能不对党员产生影响，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哲学系党内就没有反映？我们今天来提这个问题，无非是要求党员清理清理思想，从此得到经验教训，增加免疫力，再遇到大的困难，大的风浪，能更加坚定。不能认为一提“三风”影响就是要整人抓辫子。当然什么人受了影响，什么人受了多少影响，什么人没有受影响，都应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析地夸大三风的影响。

学校党委在工作检查中，承认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革命精神不如以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风影响，承认对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次反复未能坚决顶住。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甚至在一些方面犯了没有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坚持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哲学系的同志也要自觉革命，同时相互间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帮助。

第二条讲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我们又做得怎么样？

我看，近几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对哲学系党内的侵蚀是严重的，党员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党内的风气是不好的。不是大家争着多为党为人民工作，而是争着进修，关门读书，对工作挑肥拣瘦。不是大家争着多下乡下厂，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成长，而是觉得下放劳动吃亏。有的人计较自己的名利地位、工资待遇，甚至向党伸手。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少同志不是抵制它，反对它，常常是和平共处，有些人有时甚至同情支持。有的人认为“有的人的个人主义是领导造成的”，认为“个人主义人人都有，领导更厉害”，所以不愿做自我批评，也不接受批评。

讲到要团结绝大多数人，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要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等等，我看问题就更多了。

党内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尽自以为是，不自以为非，对人家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自以为一贯正确，不以为不正确；对自己看见优点，对人家只看见缺点；许多争论的中心是我正确还是你正确，永远没完。只能批评人家，不能人家批评自己，甚至拒绝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谁要批评了我，就是打击报复。以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以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党性，我们永远要这样做，这叫什么打击报复。6月29日彭真同志报告讲得很清楚，应该很好学习。既然自己如此正确，还有什么改造世界观的必要？还会有什么改造思想的要求？党内又怎么团结得起来？不彻底反对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哲学系党内团结不起来，根子是资产阶级思想。

过去哲学系有过几次过火斗争，有的人在这次被斗，在下次斗了人，有的人在这次斗了人，后来又被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被斗了，应该看到对自己也有教育作用，已经甄别道歉了，就不要总觉得委屈，永远没完。党的工作那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同志间碰碰撞撞，是常有的事，如果因为这个就心怀不满，发展下去就很危险；斗了人的，要做自我批评，吸取教训，检讨一次不够，再检讨，直到检讨到人家不愿意听了为止。大家都把这些错误当成党的共同的经验教训，互相设身处地，才可能搞好团结。都是党内同志，不能采取你死我活、一刀两断的态度。

我讲这些，不是对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讲的，是对所有同志讲的。我看大家在大家身上都有反映，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质、程度而已。谁有谁就应当首先自己检查，同时欢迎别人的帮助。不要把界限划在这一部分同志与那一部分同志之间，而应该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然口头上拥护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实际上对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听之任之，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这样是化不成的。平时放松改造，真正到了严重的考验面前，也不会考得好的。不要说真正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过好战争关，就是半工半读关，也不一定过得好的。

党员、干部要劳动化、革命化，根本办法就是：

(1) 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劳动，参加阶级斗争。不把根子扎到工农中去，知识分子是改造不好的。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是办法之一，光这个办法还不成，还要采取在比较长一点时间内，比如两三年，到公社生产队，到军队连队担负实际工作。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是更有效的。同志们是否赞成？可以讨论讨论。

实行半工半读，也是一个根本办法。

(2)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

我们过去的毛病是学得不够，用得更不够。学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准备实行之，言行不一致，这是知识分子根本弱点，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通病是：一学就懂，一放就忘，一用就错。不改变这一点，就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向工农兵学习。

我们认为要办好哲学系，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上面说的三个问题，还有党的建设、党内斗争问题，今天不详细讲，以后再讲。这些就是最大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根本问题。这几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因此哲学系办得是不是成功呢？我看是不成功的！当然我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否认同志们这些年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但是从党的要求来看，我们的工作中问题还多得很。这首先要由学校党委负责。我们的毛泽东思想不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够，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认识有一个过程，也是逐步提到的。因而过去几年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不是那么坚定、明确，而是有过摇摆，没有抓住两条道路这个纲，没有突出政治，高高举

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

哲学系的同志们是不是抓住了这些根本问题，抓住了这些大是大非呢？我看也没有！许多同志也是毛泽东思想不多，哲学系党内长期争论不休的，有一些是原则性的争论，但也是工作中的具体是非，或是干部的思想意识、作风问题，并不是哲学系的大是大非，什么黄楠森、叶朗、刘滨，把这些人关起来，哲学系就能办好了吗？

我们希望同志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今天提到的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认真想一想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在这些问题上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果在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大家认识一致，就应该团结起来，一致为实现它而斗争。

要讲谁正确？我看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我们谁也不是那么正确的，不是那么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你要觉得自己一贯坚持了原则斗争，坚持了真理，首先要看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坚持的怎么样？要是你完全正确，为什么没有把哲学系办好呢？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绝不能只抓住一些具体的是非争论不休，当然这些问题也要解决，我们看应该放在下一步，首先要提高觉悟，真正抓住大是大非，高屋建瓴，以办好哲学系为最大利益，为最高目的。

至于无原则的纠纷，应该一律禁止，应该抛弃。党组织不能搞成无原则争论的俱乐部。那样会使党组织丧失战斗力，究竟对谁有利？广大工人农民都抱着胸怀祖国眼观全球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积极努力搞革命、搞建设，我们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绝对正确而在“堡垒里战斗”，那就有愧于劳动人民。

我们认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应该是为着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应该提倡正确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正确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那种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绝对主义态度，反对只自以为是，不自以为非，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一位，不顾大局，不顾整体利益。如果抱着这种态度，那就会越争论越离开党的原则，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一切个人情绪、宗派情绪都应该去掉，有的同志说：“我有情绪，因此不能好好讨论问题，不能正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是不对的，我们都应该以党的事业，党的团结的利益为重。对领导、对同志有意见都应该正面、诚恳、坦

白地提出，特别是应该多作自我批评。多做自我批评的人是不会吃亏的。

办好哲学系是同志们的共同愿望，也是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今天形势逼人，全国人民都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出色的成绩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都想在反帝反修斗争中多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学校不能落后，哲学系也不能落后。尽管我们过去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可以变坏事为好事。我对办好哲学系是抱有希望，也有信心的。希望同志们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讨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问题，多快好省地把这个会开好，然后去迎接新的任务！

选自“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111）”

【资料】

红太阳照亮了井冈山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热烈欢呼井冈山人接电胜利成功¹

井冈山广播台记者特写报导

（女）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光辉照亮大地！

（男） 井冈山上旌旗飞扬，鼓角齐鸣，歌声震天，欢声雷动。冲破黎明的黑暗，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乘着浩荡东风传遍祖国四面八方。群山在祝贺，长河在歌唱：

（男） 井冈山人接电胜利成功了！

¹ 樊能廷注：这是近日找出来 1968 年 7 月 23 日一篇北大井冈山带电 11 千伏接电成功的广播稿。撰稿人梅斌，播音王吉生、毛福池（女）

(女) 井冈山人接电胜利成功了!

(合) 井冈山人接电胜利成功了!!! 从此在新北大, 晨曦的正气, 打破了黑暗的妖氛!!!

(男) 耀眼的灯光在巍巍井冈山上闪烁, 胜利的歌声响彻夜空。井冈山人满怀着胜利的豪情, 喜悦的泪花, 一千遍一万遍地纵情欢呼: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合)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 * *

(女) 亲爱的战友, 在聂孙崔之流反动断电, 猖獗一时, 群魔乱舞的时候, 我们是多么盼望用战斗迎来这胜利的一天啊! 目睹聂孙崔之流疯狂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井冈山人义愤填膺, 怒不可遏,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

(男) 茫茫黑夜, 是一本毛主席语录, 给井冈山人带来东方破晓的晨曦。

(女) 雪压冬云, 是一张毛主席画像, 给井冈山人带来山花烂漫的春天。

(男) 想起您啊,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那千丈绝壁, 那万顷波涛, 都被我们一一踏平, 一一战胜!

(女) 跟着您啊,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我们肩增千斤力, 胸藏万颗胆, 什么断粮断水,

断电断路, 绑架毒打, 行凶杀人, 都被我们一一粉碎, 彻底粉碎!

(男) 今天是您的伟大教导, 给井冈山人以大无畏的勇气, 最聪明的智慧, 鼓舞我们一往直前, 以敢同魔鬼争高下, 不向霸王让寸分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雄赳赳, 气昂昂, 上战场, 驱虎狼, 一举接电胜利成功!

* * *

(女)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有谁见过, 在漆黑的深夜, 没有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年轻学生, 带着一万伏的高压进行高空电压作业, 创造了震惊全市的壮举?!

(男) 有谁见过, 地面上是战火纷飞, 硝烟弥漫, 天上是乱石当空, 密如骤雨, 井冈山人镇定自若, 从容不迫, 在高空连续带电作业, 毫不动摇?!

(女)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於今, 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伟大的

壮举吗？

（男） 没有！

（女） 没有！

（男） 从来没有过的！！！！

（女） 因为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井冈山人，我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男） 几十名井冈山战士在短短两分钟内就能迅速筑起两道铜墙铁壁式的防御工事，使二流分子呆若木鸡，魂胆丧尽！这是井冈山用对毛主席的颗颗红心筑成的“忠”字长城，这是保卫毛主席的战斗第一线！

（女） 聂孙崔之流使用了燃烧弹，硫酸瓶，石灰包，高压水龙，汽枪，土炮，大搞武斗升级，疯狂对抗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破坏“七·二三”万人大会，一手挑起了7·22~7·23大规模武斗。

（男） 英雄的井冈山人面对着公社二流分子东西两线的同时夹击和十几次的轮番进攻，机智、勇敢、沉着，面不改色心不跳，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死了也甘心。井冈山人7.22，7.23保卫战惊天地，泣鬼神，打得何等漂亮！

（女） 看啊！英雄的井冈山人捡起了二流分子扔过来的燃烧弹，又向着张牙舞爪的暴徒扔回去了！扔回去了！顿时，烈火熊熊，二流分子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愤怒火海！

（男） 听啊！英雄的井冈山人自卫反击，杀声震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为刘玮烈士报仇”的雄壮声音，震天撼地，压倒了一切反革命气焰！

（女） 高压水龙何所惧，井冈山人顶得住，站得稳，没有后退半分！

（男） 二流公社抢劫公共汽车做土坦克，井冈山人杀上前去，把汽车缴获过来，作为聂元梓们武斗升级的罪证！

（女） 在我井冈山人英勇的自卫反击下，二流分子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男） 聂元梓们，你们成天吹嘘的“军事优势”到哪里去了？

（女） 高云鹏们，你们杀人成性，遭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应有惩罚！

*

*

*

（男） “赤橙红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经过阶级斗争疾风暴雨的洗礼，英雄的井冈山变得更加年轻，更加英武，更加挺拔，更加坚强。

（女） 三道彩虹凌空而起，骄傲地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喜！

（男） 三道彩虹把井冈山人的颗颗红心和中南海紧紧相连！

（女） 三道彩虹象三把利剑，直插反革命山西帮聂孙崔之流的“心脏”，宣告了聂孙崔之流反革命围剿的可耻破产！

（男） 我们用战斗把资产阶级政客的黄粱美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女） 我们用战斗把资本主义二月复辟逆流打得落花流水！

（男） 我们用战斗捍卫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

（女） 我们用战斗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男） 几道急流险滩，几重高山峻岭，多少被踩断的风光浪剑，留着我们的后边了！

（女） 几番乌云密布，几次妖雾弥漫，多少被斩碎的牛鬼蛇神，抛在我们的后面了！

（男） 几回倒江翻海，几席激流狂澜，多少被冲走的贝壳泥沙，落在我们的后面了！

（女） 湘江的潮啊，你迅跑吧！

（男） 洞庭的波啊，你奔腾吧！

（女） 搏击长空的雄鹰，你翱翔吧！

（男） 井冈山鲜艳的大旗呀，你飞舞吧！

（女） 庆祝文化大革命第五战役中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男） 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 * *

（女）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格外缅怀被聂孙崔之流杀害的刘玮烈士。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战士刘玮烈士，你生前就盼望着这胜利的一天，你在国民党刑讯室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井冈山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崇高气节！

（男）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今天，你的这个遗愿实现了！你安息吧！你的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前进！挥泪继承先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烈士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我们誓以你为光辉榜样，站在第一线，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死了也甘心！

* * *

（女） 太阳出，冰山滴。

（男） 梅花笑，苍蝇泣。

（女） 山上开心日，佛门断肠时。

（男） 当我井冈山人尽情欢呼这个胜利的时候，反革命山西帮聂孙崔之流，却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失败的哀鸣。我们接电胜利成功永远地结束了他们自我吹嘘的所谓优势。7.22，7.23 井冈山人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有力地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围剿。

（女） 现在，在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的召唤下，千百万群众走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聂孙崔之流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给挑动武斗、顽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的反革命山西帮聂孙崔之流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就是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反革命山西帮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灭亡的日子就在眼前，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男） 我们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宣布：

（男） 别了，反革命山西帮聂孙崔之流断电的法西斯政策！

（女） 别了，北大二流公社管电闸的小丑！

（男） 随着接电的胜利成功和7·22，7·23 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一个向二月逆流派大反攻、大进军的伟大日子就要到来了，杨余傅的乏走狗聂孙崔之流及其黑后台的最后垮台已经为期不远了！

（女） 望着金光四射的井冈山，我们激情澎湃！红太阳啊，您给了我们火焰、热情和光明！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斗争的智慧、胜利的信心！

（男） 红太阳啊，您照亮了万里山河，照亮了我们面前何等宽广的征程！

（女）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淮海战役的连天炮火；

（男）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点燃了长安街头辉煌的灯火；

（女）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点燃了亚非拉美的熊熊烈焰！

（男） 望着今天井冈山上光芒万丈，我们仿佛看见八角楼的灯火在闪光！

（女） 望着今天井冈山上光芒万丈，我们仿佛看见枣园的灯火在闪光！

(男) 望着今天井冈山上光芒万丈，我们仿佛看见中南海的灯火在闪光！

(女)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井冈山人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无限忠于您的火热红心；我们的血管里，沸腾着无限热爱您的鲜红血液！我们是您最忠实的儿女，我们是站在第一线保卫您的英勇卫士！

(男) 红太阳照亮了井冈山，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新北大，晨曦的正气，打破了黑暗的妖氛！！！

我们向毛主席老人家宣誓：您亲手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我们走定了，我们今天走，明天走，永生永世不回头！我们风里不会摇，浪里不会摆，一颗红心永向您！斩尽变色龙，杀绝小爬虫，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

(女) 让井冈山上的战旗迎着万里东风，高高飘扬！

(男) 让井冈山上的号角伴着万道霞光，响彻四方！

(女) 让井冈山上的英雄儿女踏着光明的征途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男) 毛主席啊毛主席，天上的群星永远朝北斗，地上的葵花永远向太阳，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让我们井冈山人一千遍一万遍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合)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

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着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